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主办 第5期（总第413期） 2024年5月5日

- ◆ 沉痛哀悼相重扬老部长逝世.....郭书田(1)
- ◆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从何处着力.....赵新宁(2)
- ◆ 党史上的“老何家”，与吴石不为人知的三代缘.....宋春丹 黄 卫(7)
- ◆ 城乡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刘守英 李昊泽(16)
- ◆ 大食物观——国情的农业推理.....张蓝水(31)
- ◆ 文化区域差异的两个样本：陕南秦岭和滇东南农村.....贺雪峰(35)
- ◆ 光合高脂膜使农作物提质增产，减药减肥成为现实.....徐 静(37)
- ◆ 关于农村固定观察点由来的回顾.....孙中华(38)
- ◆ 学好全国“两会”精神，共谱壮美新华章.....丁玉华(41)
- ◆ 大寨——全国最封闭的村庄.....陈大斌(44)

沉痛哀悼相重扬老部长逝世

郭书田

农业部德高望重的老部长相重扬同志因病于4月22日在北京逝世，我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表示哀悼，并向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

我与相部长有70年交往的历史，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在高等教育部农林卫生司任职，主管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工作，我在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任职，北京农业大学是重点大学，他与我相识，并经常来往，关系甚好，一是他是长者，二是他是上级部门。农大由高教部主管变为由农业部主管，农林卫生司转至农业部建立了宣传教育局，他跟着到了农业部，仍主管全国高等农林院校的工作，在我调到农业部工作以后，一见如故，十分亲切。他在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在农业教育战线奔波，作出重要贡献。在我与他直接相处中，使我深受教育与感动。总结了几句心里话：

赤胆忠心，无私奉献。

鞠躬尽瘁，奋力前行。

虚怀若谷，不求功名。

他的高贵品德，是我学习的榜样，他虽已去世，而他的好思想，好作风永存不朽！

（郭书田：原农业农村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原所长，高级经济师。2024年4月28日）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从何处着力

——对话张合成、罗必良、王晓庆、甘元田

赵新宁

嘉 宾：

张合成：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

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王晓庆：水木数字农业科技集团董事长

甘元田：湖南省浏阳市南川河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主持人：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赵新宁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必须锚定农业生产能力的大幅增强、生产领域的大幅拓展、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生产韧性的大幅提高、生产收益的大幅增效等几个基本目标。

“新质生产力”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热词，它既强调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也包含以产业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在部署各项工作时，都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放在重要位置。农业作为基础产业，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举办的“农经观察”第50期会商会议，围绕“农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展开多角度讨论。农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怎样的特殊性？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需要处理好哪些关系？如何推动加快形成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本期对话邀请张合成、罗必良、王晓庆、甘元田等专家和一线实践者展开交流讨论。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以农业科技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主线，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入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等手段，提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和资本等农业要素优化组合而形成的全要素生产率，旨在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由量变到质变，加快推进农业深度转型升级，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主持人：新质生产力标志着生产力的质变与跃迁，是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探索与遵循，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样要遵循这个大逻辑。您认为，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要遵循哪些普遍规律？

张合成：首先，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三新一高”理论框架下去推进。其次，把握新质生产力质态的原创性要求，一是技术的革命性变革，不是革命性的、跃升的，就不能定义为新质；二是要素创新性配置，传统的要素配置方法不能催生新质生产力；三是产业的转型升级。具体到农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要遵循这样的规律：一是质变的先导性，一定不是量变，而是以质变为判断标准；二是集成的系统性，也就是生产关系的系统性；三是创新的连续性，而不是偶尔的发现；四是产业的稳定性，没有稳定产生效益的产业尚不能构成新质生产力。

罗必良：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新质生产力正在影响和改变着农业发展进程，农业产业也由原来物质短缺时代更多追求农产品的数量增长，转向多样化的功能性拓展与结构性转型升级。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核在于，以农业科技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主线，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入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等手段，提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和资本等农业要素优化组合而形成的全要素生产率，旨在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由量变到质变，加快推进农业深度转型升级，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主持人：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无论从历史的维度，还是从现实实践的角度，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景都是十分广阔的。您认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具有哪些特征，其目标定位是怎样的？

罗必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可以总结为：以高素质劳动力为主体特征，以颠覆性创新为技术特征，以多要素渗透融合为配置特征，以农业边界突破与产业链条延伸为结构性特征，以数智化和绿色化转型为形态特征。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必须锚定几个基本目标，一是农业生产能力的大幅增强，通过培育新型劳动力、更新劳动工具和拓展劳动力对象，着力夯实农业保障农产品供给的重要功能。二是生产领域的大幅拓展，利用新技术开发更广阔的国土资源，生产丰富多样的农产品，为保障食品安全来突破农业的可能性边界。三是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通过技术创新着力提高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进一步激发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潜力。四是生产韧性的大幅提高，以绿色高效要素确保资源环境的绿色可持续，以智能科技应对气候与灾害冲击，以先进种业科技应对生物安全。五是生产收益的大幅增效，利用新技术，创新新模式，发展新业态，深度开发农业多种功能与挖掘乡村多元价值，促进三产融合发展、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张合成：农业新质生产力，一要有高科技特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以重大科技创新为引领，按照我国的国情农情建立完整有效的农业科研、农业教育、农业推广三大体系，汇聚科教兴农的强大合力，形成高科技的生产力。二要有高效能特征。突出创新活跃、技术密集、价值高端、前景广阔等表现，培育壮大种、肥、药、饲、疫等生物生产，农机、表型、监测、传感器等智慧装备，生态产业化与废弃物资源化为主体的绿色低碳产业。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形成高效能的生产力。三要有高质量特征。表现为高品质、高性能、高可靠性、高安全性、高环保性的产品和服务。以土地改良、垂直空间、戈壁农业、海洋牧场等要素资源拓展，提升改造种植、畜牧、水产、林业，解决小农户、小田块、小农资、小企业适应性问题，以新供给与新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为落脚点，形成高质量的生产力。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必须处理好国家粮食安全、耕地压力与生态安全的关系，技术创新、效率改善与产业链韧性的关系，尤其是要处理好生产力发展与小农发展的关系。

主持人：新质生产力为我们在新发展阶段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增加经济发展新动能提供了重要指引。您认为，在农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怎样的特殊性？

张合成：在农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看到特殊规律性：一是农业领域的长周期性与技术变革的革命性的关系。二是农业的低效益与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要素的单向流动导致市场配置有难度。三是农业多重风险导致的不稳定性。四是农业的传统属性与培育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难度。新质生产力既面向新兴产业，又要布局未来产业，而农业传统产业的性质决定着这两方面都有难度，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五是国情农情特点和高素质劳动主体的关系构建。在大国小农的国情下，小农户、小企业怎样创

造出变革技术。最后，要坚定信心，历史性成就和变革已经催生了一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这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底气所在。

罗必良：多种因素所构成的基本国情与农情，决定了我国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特殊性。人口总量大决定了农业的供给安全导向，资源约束紧决定了农业的绿色集约导向，地域空间广决定了农业的多功能导向，不确定性大决定了农业的韧性建设导向，小农户主体弱决定了农业的社会化服务导向。因此，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必须处理好国家粮食安全、耕地压力与生态安全的关系，牢固树立大食物观、大国土观、大农业观；必须处理好技术创新、效率改善与产业链韧性的关系，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拓展农业的生产边界与功能空间，以应对不确定性，确保风险最小化。尤其是要处理好生产力发展与小农发展的关系，既要提升颠覆性农业技术创新与小农的兼容性，也要提升农业要素创新性配置与小农的兼容性，在有效组织小农的基础上，强化迂回性投资与社会化服务，将小农融入新质生产力和农业高质量的发展进程中。

王晓庆：新质生产力发生变革的核心是新技术、新的人口结构和新消费场景带来的产业升级模式。比如目前的基因研究、装备制造、自动化管控、数字模型等新变化，已进入到大众可以消费的阶段，而消费者对更健康、更安全食品的需求，也会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农业新质生产力应该具备技术程度更高、人力更少、劳动效率更高、从业者收入更高、农产品性价比更高、整体产业链更加绿色低碳、损耗更少等特征。

主持人：我国是农业大国，但还不是农业强国。您认为，当前在农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哪些短板和瓶颈？

王晓庆：我们在与科研院所合作的过程中显露了一些问题，比如企业做基础研究，而科研院所更多在做企业应用，出现了角色错位，发挥不了各自的最大优势。另外，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时，往往需要先立项、再打款才能启动项目，对企业来说负担很重。企业的具体研究项目都具有特定作用，比如农业灌溉领域管道的研究与应用，管道外部是白色的，内部是黑色的，这样不容易在太阳光照射下升温，内部不容易出绿苔。我们希望在农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在大环境下坚守初心和本位，把每一项细节工作做好。

甘元田：以我们农业合作社为例。合作社现有社员 33756 户，年出栏生猪 3000 万头以上，以合作社为组织平台，开展生猪养殖、经营、管理、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以前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现在慢慢向“消费者+合作社（联合社）+家庭农场”的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社模式转变。在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如果把一个县作为一个单位，就存在一些瓶颈，一是政产学研银企没能很好地联合，在生产、经营、管理、服务、消费方面也没能融合发展，达不到共赢共富的效果；二是一些企业的大局意识、区域品牌意识还不够，通过“合作社的组织平台+新质生产力”赋能生产者、经营者、管理者、消费者，实现共创共建共享，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张合成：农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这些短板。一是科技进步主体不够稳定。一些经营主体与市场主体的地位尚未明确，科研单位分类纷繁复杂，一种分类一套制度，制度与制度之间存在差异和壁垒。二是符合农业科技发展规律的制度体系不够完善。农业科技具有季节性、公共性、基础性、长期性等特征，农业科学研究也具有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这就需要尊重农业科技人员劳动方式，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而不能让人的创造性活动为经费服务。三是农业要素投

入强度不够，农业科技投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社会资本、地方、企业科技投入水平较低。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传统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在农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出现新瓶装旧酒、新鞋走老路、两个轮子不同步、看不见小农户和小企业等倾向性问题。

主持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您认为，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需要处理好哪些关系，注意哪些问题？

罗必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必须推进以农业技术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为核心线索的战略部署与政策支持。一要加强关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研究。二要完善农业科技管理机制。三要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四要加强农业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培养，要在实践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特别是农业企业家队伍建设。五要加强农业科技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农业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技术创新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建设，没有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农业科技进步会大打折扣。

张合成：农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出现一些倾向性问题。一是新瓶装旧酒，也就是贴标签，认为在新质生产力里面加农业两个字就是农业新质生产力。二是新鞋老走路，新质生产力一定是一条崭新的道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崭新的，需要在理论界深化研究。三是两个轮子不同步，要找到造成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根源。创新是技术和改革双轮驱动，包括国家创新体系的设计，需要深入研究，认识到其堵点、难点、痛点究竟在哪里。四是看不见小农户和小企业。说到高素质劳动者，只看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人才力量和国家工匠。要知道，小农户和小企业是我们的主体，没有小农户和小企业，就没有科技进步的载体。

王晓庆：农业新质生产力除了劳动力、劳动对象和生产工具，我认为还应该再增加一个要素，也就是大自然。在农业领域增加自然要素，就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由此构建出农业的生态价值计量，让农业的生产和销售环节价格更优、品质更好、收益更高。因为农业不是纯经济项目，农业考核标准包括品质、成本、产量和可持续发展等多个层面，单算经济效益是不全面的，因此要重视农业新质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的生态价值。当下各个地方都在推进农业的生态价值计量，包括农业碳汇的方法学开发以及交易等，以期最大程度地把生态价值考虑进来。

主持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重在统筹谋划，要把握科学的方式方法。对于推动农业领域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您有哪些建议？

张合成：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传统的生产力发展模式。按照这个思路，推动农业领域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首先要摆脱资源开发无序扩张和粗放型经济，优先推进技术革命性变革与应用。其次要推进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实现人、地、资金、技术、网络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通。再次要尽快研究解决生产关系的适应性问题，实现生产力诸要素组合方式的跃升，这种跃升不是一般性的渐进性推动，而是主要靠深化改革来推动。最后要进一步深化对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的认识，推动对小农户、小农资、小粮贩、小企业，以及对要素、资源、服务的优化配置再认识再创新。

罗必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必须走农业绿色高效发展之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确保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加强科技创新服务产业发展。一是面向全球未来农业产业高地，实施“未来农业科技行动计划”，在合成生物学、生物制造、数字农业等前沿领域取得一批世界级成果。二是面向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施“农业新兴产业科技行动计划”，构建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优势产业+特色优质产业”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三是面向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态势，实施“农业数字化生产力行动计划”，

重点部署现代数字种业发展工程、畜禽养殖管理智能化工程、智慧农机发展工程等。四是面向农业绿色发展战略布局，实施“绿色低碳农业发展科技行动计划”，重点部署山地农业、海洋农业、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等科技领域。五是面向农业经营方式转型，实施“新型农业劳动者与经营主体培育计划”，培育一批扎根乡村、服务农业、带动农民的创新创业群体。六是面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全面振兴科技行动计划”，并进一步延伸到营养健康、医学和公共卫生、生态文明、农业文化等新领域与新业态。

甘元田：建议完善农业领域的组织体系建设。因为农业领域的管理者、服务者，不仅为老百姓提供生产资料、农产品价格行情的预警服务，还可以推动组织体系与一二三产业实现融合发展，在产业的发展方向上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消费为中心，将生产链、产业链、生态链的模式推广到林牧副渔等更多领域。进一步来讲，还要引导农业领域的组织体系向数字经济平台发展，使其产生更多增值服务，调动更多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主持人：当前，农业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初具雏形，并展示出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请您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实践进展。

甘元田：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不只是生产产品、提升生产者的素质，还需要用科技赋能，在生产过程、管理、服务等多方面提质增效，这些都做到位以后才能产生品牌效应，形成大家共同认可的理念和组织平台。比如，合作社每月周一到周五通过平台发布信息，合作社与社员点对点分享；引导社员规避风险，采取适时补栏出栏等措施，看准行情合理利用价格差增加收入；多方面联系企业为社员提供优质产品的同时，要求企业为社员提供技术服务支持以及生物安全防控知识的培训。

王晓庆：举例来说，产业融合把工业技术注入到农业，提高生产效率，同时结合现代化的互联网和数字营销方式，形成新的经营模式。同时，我们努力改进和完善农业碳汇的方式方法，包括碳核查、碳计量，形成全新的农业生产销售模式。比如，蔬菜最佳的生产温度是15-30℃，一旦能源成本大幅上涨，生产设施增温就面临很大的成本压力，所以我们探索了其他路径，在发电厂、煤化工、钢铁厂、水泥厂和污水处理厂等里建蔬菜工厂。

主持人：推进农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件大事、要事、新事，任务是繁重的，但前景也是广阔的，要下足力气、把准方向、做实抓手。既需要深刻领悟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要义，准确把握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这三个特征的逻辑关系，也要认清我国农业仍然存在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等现实问题，着力提升前沿农业科技水平，大力培养具有原创精神、具备交叉学科素养、掌握前沿科技的高素质创新性涉农人才，还要不断拓展农业边界，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引领农业新兴产业、新业态的创新发展。通过创新体系建设、产业变革发展、提升生产力动能，全面提升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水平，加快推动农业强国建设。感谢四位嘉宾做客《对话》栏目，带来精彩观点！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来源：农民日报客户端，2024年4月25日）

党史上的“老何家”，与吴石不为人知的三代缘

宋春丹 黄 卫

在这位生死至交的影响下，吴石将军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每逢清明，原农业部部长何康都要率家人去位于北京香山南边的福田公墓扫墓。

在这里，三位老友之墓并肩而立。左边是何康的父亲何遂之墓，右边是何康的岳父缪秋杰之墓，中间则是1950年在台湾就义的吴石将军之墓。三人都曾在民国政府高层担任要职，也都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同行。

何遂是老同盟会会员，但其三子一女一媳皆为中共地下党党员。其中，何康和两位兄长1939年底组成的“特别党小组”先后受叶剑英和董必武单线领导，被视为“战略棋子”。

随着何康和弟弟何达2021年7月先后离世，何家第一二代多已集体谢幕。如今，接续修家族史、张罗聚会扫墓等重担就落在何康长子、第三代中的“领头羊”何迪肩上了。毕竟，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老何家”，其家族的历史也正是中国历史的一块重要拼图。

“战时农都”

2021年4月初，春寒料峭。98岁的何康在北京医院住院已近两年，90岁的何达确诊淋巴瘤晚期，即将入院化疗。何达多年来一直在为家人做口述史，搜集整理资料。入院前，他将这些资料全部托付给了何迪。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何迪家中看到，那是几个白色亚克力收纳箱，上面分别贴着“吴石”“何遂”“何康”的名签。吴石资料箱里，有他的狱中绝笔拓件。

那时何迪刚卸任瑞银证券董事长，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他决定趁着还来得及，踏上追寻父辈足迹的寻踪之旅。

他和妻子王苗首先访问了父亲1940年入读的广西大学农学院。农学院位于柳州沙塘，拥有一批海外留学归来的大教授，师资力量很强。除农学院外，沙塘还有农业科研和试验基地，三位一体，被称为“战时农都”。何康曾说，生我父母，育我沙塘。

那时何达在沙塘读小学，在他眼中，广西大学农学院是如此美好。马路笔直，路边高高的尤加利树可用作枕木，校园里还有篮球场、剧场，游泳池铺设着木地板，通往镇里的路上小桥流水，风景如画。

何迪见过父亲保存的大学笔记本，其中有一册用英文、拉丁文和中文列出植物学名，旁边画着对应的植物图。见到花草树木就说出其拉丁学名，成为何康终身的爱好。秋天院子里银杏树金黄，他会说“Ginkgo biloba”（银杏拉丁名），这成为何迪唯一知道的植物拉丁学名。解放后，农林业成为何康

终生的职业，直至改革开放后担任了农业部部长。

抗战时，何家五个孩子都曾在广西工作或读书，这是因为，何遂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桂林行营（后改为桂林办公厅）中将总顾问。

桂林行营下辖数个战区，其中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为张发奎，司令长官部驻柳州。1940年起吴石担任了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陈宝仓任该战区中将副参谋长。在12个战区中，第四战区是国共合作保持得较好的。

何遂与吴石是福建闽侯同乡，在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中相识，此时已成莫逆之交。何康在位于柳州的广西大学农学院读书时，常得吴石关照。

何康和两个哥哥都已入党，同属于一个“特别党小组”。大哥何世庸是三兄弟的领头羊，11岁就被送到加拿大留学，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沈阳读医学预科，“像换了一个人，发疯一般投身学生抗日活动”，两个弟弟也跟着他走上革命道路。这个特别党小组在叶剑英回延安后改由董必武单线领导。董必武指示他们，“勤学勤业勤交友”，长期埋伏，待机而动。

何遂的另一位至交缪秋杰时任国民政府盐务总局总办（局长），由于这层关系，何家老大和老二都进入了盐务系统工作，以此为合法身份。

缪家大小姐缪希霞也在广西大学读书，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清秀佳人，校花级人物。何家有四子一女，缪家有四女一子，两家都希望结成儿女亲家。有一天缪秋杰竟直截了当问女儿，“大”好还是“三”好（缪家姐妹对何家兄弟的称呼），并要她早点决定。缪希霞最终选择了比她小三岁半、性格阳光热情还爱批评她的何康为终身伴侣。

1944年湘桂大撤退时，吴石下令军列临时加挂车厢疏散难民，何康和农学院的同学们得以辗转撤回重庆。吴石还派副官将缪希霞、何达等一家老小送上撤往贵州的火车，这位副官，就是日后与吴石一同牺牲在台北马场町的聂曦。

俭德坊2号

2021年8月，处理完父亲和叔叔的后事后，何迪和妻子王苗、弟弟何巍再次踏上寻踪之旅，这一站是重庆。

他们下榻在北温泉柏联酒店，入口处就是父母举行婚礼的数帆楼。1945年双十节，何康和缪希霞在这里结婚。直到两个月前订婚时，何康才正式告知缪希霞自己是中共党员，组织已批准他们结婚。1946年12月，长子何迪在南京出生。

抗战胜利后，何遂和吴石都回到了南京。何遂继续担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吴石则调任国防部史料局（后改为史政局）局长。这一时期，两人交往更加密切。

何遂和吴石同为新式职业军人，又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皆能成篇背诵《左传》《战国策》等古文。他们都酷爱古典诗词书画，尤其喜爱苏东坡书法。吴石曾刻了一枚闲章“戎马书生”。

诗画唱和是他们精神交流的一种方式。1943年中秋，吴石虚岁50，何遂为挚友写下《百字令·对酒当歌》：“收拾乾坤归腕底，吾辈固应如是。多少英雄，古今人物，去去长江水。”豪情溢于言表。

内战爆发后不久，何家三兄弟的关系转至中共中央上海局，由上海局主管统战工作的张执一单线联系。

1947年10月，上海局成立了瑞明公司，作为新的经济据点。公司名义上由何遂和缪秋杰出资，实际上资金来自上海局，主要为解放区筹办西药等急需物资。何康担任总经理，财会专业毕业的缪希霞担任公司会计。一年后，根据张执一的指示，缪希霞也正式入了党。

何达后来评价，大姐（指排行老大的缪希霞）是个典型的爱情至上主义者。何迪很同意这个看法，他深深感受到母亲对父亲那种无条件的爱和追随，他觉得，那是一种超越政治的纯粹的爱。

何家卖掉了南京老宅，举家迁往上海，住进了愚园路俭德坊2号。这是一栋独门独栋的三层西式小楼，十分幽静，实际上成了上海地下党一处秘密联络点。

2007年，何康带着一家人重访了俭德坊2号。门外，法国梧桐已干老枝粗。登上二楼，何康指着告诉何迪等人，这是爷爷奶奶的卧室，这是他和缪希霞的房间，通阳台的一间是何嘉的香闺。三楼除何达的卧室外，就是一间存放贵重药品的仓库。

何康还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那是1948年8月，几个经济警察突然闯入，说是接到举报要搜查违禁物品。当时何遂和亲家缪秋杰都在客厅里，接待的贵客是监察委员张维翰。警察见这几位都来头不小，只草草查看了一下就离开了，要何康第二天去警局接受讯问。其实，当时他们床下就放着X光机，三楼库房里存着盘尼西林等进口药品。当晚缪希霞熬通宵做出了一套假账，又经过疏通，此事以“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那一阶段，吴石是何家常客。他和何遂总是用福建闽侯方言聊天，在何家子女听来“叽里咕噜的比外国话还难懂”。

何遂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政治上清醒而敏锐。他的家庭氛围很特殊，成年子女都加入了共产党，无一例外，他自己也很早就跟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内战爆发后，他越来越相信，救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在爱国、抗日、反蒋这条心路上，吴石和何遂完全一样。吴石先后从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成绩都是第一名，有“吴状元”之称，后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被视为日本通、军界才子，但他不是蒋介石嫡系。何康曾写到，吴石自视颇高，却一直无缘军队实权，这是他“难解的心结”。他对蒋介石重用嫡系的无能之将深感不平，对蒋介石大打内战痛心无比。

1947年，他在《国防新报》上发表文章：“吾国人心之诟病，频年如江河日下，令人不寒而栗……举国滔滔莫不以竞逐私利为务，违法败纪，寡廉鲜耻，残忍刻薄，冷漠无情之事实，随处可见，随地可见。”

吴石在内战早期就预言国军必败，多次对友人喟叹：“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何遂对他说话极其透明，经常慷慨陈词，吴石终于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同意与中共代表直接见面。也正因此，后来国民党方面痛批何遂是“近代中国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



1950年，何家在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前留影。

从左至右，前排为：何敏、何仲山、何迪；
后排为：缪希霞、何康、陈坤立、何世庸、何遂、何达、何嘉。

“风萧萧兮易水寒”

1947年4月的一个中午，上海局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在著名的锦江饭馆（也是地下党一个秘密据点）宴请吴石。沟通是闭门进行的，何遂和何康都避到门外等候。之后，何康接到指示，保持与吴石的单线联系。

此后，在愚园路俭德坊2号何家寓所，张执一和吴石多次单独会面。吴石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大多是自己坐夜班火车来，有时也派副官聂曦送来。

1949年3月，吴石亲自到俭德坊来，把包括《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国防部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在内的一组绝密核心情报交给了何康。让何康印象很深的是长江江防图，这是一张很大的图，图

上标注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他知道这组情报的分量，迅即送交张执一。

情报很快送抵即将展开渡江作战的三野。解放后，三野参谋长张震曾两次向何康提及，这组情报对部队渡江作战帮助很大。

这样的重要战略性情报还有很多。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被有关部门列入隐蔽战线人物书系推荐的《冷月无声——吴石传》写道：“吴石将军本身就是军事战略专家，加上身居要职，因此，判断情报价值驾轻就熟，探取情报如鱼得水，相对容易。其提供情报的价值非常人可比，如同雪中送炭，其贡献难以用语言、数字表述。”

4月下旬，吴石即将南下，赴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临行前一晚，何康夫妇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卡弗卡斯咖啡馆为他践行。咖啡馆是一个白俄罗斯人开的，有个不大的舞池，留声机不停地放着《何日君再来》等舞曲。

当时解放军已首先从安徽胜利渡江，他们会心地交换了对局势的看法。何康已奉命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双方知道今后很难再直接联系，都不胜惜别之意。吴石平时讷于言，当晚却心情激越，兴奋地跳舞，还用福州乡音吟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没想到，一语成谶。

福州解放前夕，吴石于8月16日飞赴台湾，就任“国防部”参谋次长。何遂次子何世平已在台中、台南盐务机构潜伏三年多，母亲陈坤立与他同住，何遂和女儿何嘉也已于6月赴台。

此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6月，香港报纸登出了上海军管会名单，何康作为农林处处长赫然在列。消息传到台湾，何世平的同事们私下议论纷纷，有人甚至散布“何家兄弟都是共产党”。

8月，吴石和何遂多次以携家人游山玩水的名义密商。吴石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在台湾这个海峡阻隔、交通不便的地方，就需要在组织上建立更紧密的秘密联系。这是一种甘冒斧钺的选择。

风声日紧，吴石催何遂一家赶快离台。何遂也担心吴石的安全，吴说自己不要紧，有“国防部参谋次长”这块牌子掩护。

何家人分两路撤离。9月1日，何遂夫人、何世平一家与何嘉由基隆乘船驶往广州（当时还未解放），再转往香港。吴石则替何遂买好从台北直飞香港的机票，亲自开车送他去机场，目送他上了飞机。

九十月间，吴石亲赴香港，在何嘉的协助下与中共上海局驻港负责人接上了关系。12月，何遂夫妇和何嘉从香港返回了上海。

然而，仅仅隔了半年，就传来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噩耗：1950年6月10日，吴石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年仅57岁。

闻此噩耗，何遂痛不欲生，致心脏病发作住院。

何家孙辈们曾回忆，吴石的遇害对爷爷打击极大，他认为挚友是替自己赴难的。何康后来在纪念吴石的文章中写道：“对这位生死知己的死，父亲怀着复杂难言的隐痛，这伴随了他整个晚年。”

“有事找何康”

吴石牺牲时，他的长子吴韶成正在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一天他在学校图书馆翻阅报纸时，从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看到一条豆腐块消息《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犹如五雷轰顶。

早在父亲刚赴台时，吴韶成有天突然在自己的信箱里发现一个小纸条，也不知道谁塞进去的，上面是父亲的笔迹，用铅笔写着一句话：“有事有困难你找何康。”因此他立即前往上海，找到了时任华东

局农林部副部长的何康。

何康除证实吴石确已牺牲外，没有提供任何消息。他还嘱咐吴韶成，不要多说这些事，因为“牵涉的人太多”，万一遇到组织审查，就告诉对方找华东局。

从此，吴韶成和留在大陆的妹妹吴兰成一直守口如瓶，家庭出身一栏里填的是“国民党旧军官”。在台湾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此后也杳无音信。

吴韶成大学毕业后分到郑州的河南冶金局工作，吴兰成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大兴安岭的牙克石林场当了儿科医生，先后入了党。“文革”期间，兄妹俩都受到审查，党籍不予恢复。

1972年，吴韶成向中央写信申诉。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直接过问下，由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操办，中央有关机关以密件形式向兄妹俩所在单位出具了公函。公函明确说明，当年为了保密起见未给吴石子女发烈士家属证明书，“今后对吴韶成（吴兰成）同志应作革命烈士子女看待”。

这份烈士证明迟到了23年。作为吴石的直接联系人，何康遵照组织指示让吴韶成兄妹保守秘密，但作为个人，他深感内疚，承受着心灵的重负。

五六十年代，何康奉命来到海南儋州，创建起“热作两院”（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和海南热带作物学院），致力于发展新中国橡胶事业。体弱多病的缪希霞也离开北京，随他来到海南。夫妇俩始终牵挂着吴石留在大陆的这双儿女，却爱莫能助。

1978年1月，何康调回北京，担任农林部副部长。他和缪希霞开始尽己所能地帮助吴家兄妹。

不久，吴兰成夫妇从工作了20多年的牙克石林区调入北京。

直到很多年后，吴兰成都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促成的。她在发给何迪的微信中回忆，牙克石是一个当年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非常寒冷，冬季气温低达零下40℃。70年代末农林部从基层选调科技人员到部里，其中就包括她的丈夫陈进森，她也因照顾夫妻关系随同进京。初到北京人生地疏，找工作成了难题，是“希霞姐”主动帮她，她才得到去中医研究院信息所应聘的机会，被聘为副研究员。

实情是，1976年缪希霞从广州到北京探亲，途经郑州时专门去探望吴韶成夫妇，得知了吴兰成的情况。农林部从基层选调干部时，正是何康特别推荐了陈进森。

1980年5月，吴石夫人王碧奎移居美国洛杉矶，与幼子吴健成一起生活。为让吴韶成、吴兰成赴美探母，有关部门作出了特别安排。

这年10月，何康率科教代表团访美，专门到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为吴家兄妹赴美打前站。行前，缪希霞细心地帮他有关部门交代的六点注意事项列在记事本上，包括订票、签证、联络方式等，还有一条是：代表中国政府欢迎王碧奎和吴健成回国，或探访，或定居，领馆将给予签证、经费、机票、交通等协助。缪希霞还附加了自己的建议：了解王碧奎的居住条件和安全情况；吴兰成想参观美国医院、收集医学资料，也请领馆帮助安排。

次年，吴韶成、吴兰成随中国冶金代表团访美，小妹吴学成也从台北赶来。王碧奎当年受吴石案牵连入狱，在吴石被执行死刑后两个月才被释放，独自含辛茹苦抚养大两个幼年子女。历经32年磨难，一家人终于在异国他乡团聚，抱头痛哭，吴韶成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

90年代初，吴石骨灰安葬事宜提上了日程。缪希霞建议，在福田公墓购地，为吴石建造墓地。

福田公墓北依燕山山脉，西邻八大处，是北京市高等级公墓，许多社会名流葬于此。“文革”结束后，在缪希霞主持下，缪家从退赔和变卖缪秋杰生前所住四合院的款项中拿出两万，在福田公墓建了家

族墓地。

经有关部门同意，就在缪家墓地旁为吴石造好了墓室，竖起了墓碑。墓碑高约 1.6 米，宽约 1 米，碑身为汉白玉，顶端刻着一对麒麟浮雕，庄重雅洁，等待着吴石将军的归来。

何康陪吴韶成、吴兰成验收了完工的墓地，又一起参加了罗青长等领导的会见。罗青长对兄妹俩说，“我们对你们父亲的事一直念念不忘”，自己就是当事人之一，周恩来总理在弥留之际还专门把他找去交代，不要忘了在台湾的朋友。

1993 年，王碧奎在美国去世。1994 年 4 月 22 日，何康代表有关部门主持了小范围的吴石夫妇骨灰安放仪式，吴家四位子女、何家第二代健在者悉数出席。

何康致悼词：“吴石将军反对内战，致力于全国解放和祖国统一的大业，功垂千秋。吴石将军博学多才，廉洁奉公，忠厚待人，爱憎分明，一生两袖清风，在那个时代实属难能可贵，这是我们亲眼看到和亲自受到的教育。”其间，他哽咽不已，老泪纵横。

在 2008 年何遂诞辰 120 周年之际，何家决定建立家族墓。何遂 1968 年病逝后，骨灰存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家族墓造好后，何家开具证明，将他的骨灰迁出，葬于吴石墓地之畔。

由何达撰写的墓志铭写道：“先生性豪侠，广交游，平生知己莫过吴石与缪秋杰。今三人墓室相邻，岂天意乎？”



北京福田公墓，何遂、吴石和缪秋杰的家族墓相伴为邻。

为了父辈的嘱托

吴石的骨灰入土为安，子女也都得到了妥善照顾，但何康还有一桩心事未了。

直到那时，对吴石的纪念都是在保密情况下进行的。作为历史当事人，何康希望有生之年能将自己

所知的吴石事迹书写出来，使他的英名得以在公众中传扬，不受误解，不被湮没。但当时条件还不具备。

时间又过了十多年，来到2006年。这一年，在何康和何达的协助下，民政部正式向吴石子女发放了烈士证书。当年的“特别党小组”，老二何世平已去世多年，何世庸92岁，何康自己83岁，可谓时不我待。

何康邀请大哥何世庸和妹妹何嘉一起回忆，由何达整理，写出了《从大陆战斗到台湾——缅怀吴石伯伯》。口述成文后，何达分别发给吴韶成和吴兰成，请他们过目提意见。

吴韶成建议，将父亲的绝笔诗纳入文中。1981年吴韶成兄妹赴美探亲时，母亲出示了父亲写于一本画册背面的狱中遗书，这首诗就写于遗书末尾。诗中写道：“天意茫茫未可窥，遥遥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何康三兄妹的文章发表于《百年潮》2007年第一期，首次披露了吴石所提供情报的重大价值。第二年，何世庸就去世了。

2013年底，由总政联络部主持，位于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这是为纪念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的隐蔽战线无名英雄而建的，在台北马场町一同遇难的四位烈士吴石、陈宝仓、聂曦和朱枫的塑像立于广场中央。

纪念广场落成后，何迪陪91岁的父亲何康、90岁的继母郁隽民（缪希霞1992年病逝）和83岁的叔叔何达去西山拜谒。车停在山脚下，三位老人走走歇歇，累得直喘气，但坚持要爬上去。在吴石塑像前，何康眼泛泪光，深深行了三鞠躬礼。

吴石狱中遗书还提到两个遗愿：一是希望“诸友好”为他编印其生平军事著作和诗词，二是希望子女将他所收藏的书整理保存，设立小规模图书馆，“俾我爱书与好读之美习，传诸后人”。但这两个愿望都难以实现。吴石被捕后，他在台北的寓所被查抄，手稿《左传兵法》以及为写作《新国防论》《抗日回想录》等文稿所搜集的资料片纸未留，家中藏书也全部散失。

2021年，何康和何达去世。吴石的遗愿，也成了他们未竟的心愿。

这个遗憾终于得到了弥补。经过吴石传记作者郑立等人十年的努力，60多万字的《吴石遗墨》2022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何迪将父亲和叔叔留下的资料编撰成书，2023年出版了《何康的青少年时代》和《何康海南岁月家信文稿珍辑》。其中，《何康的青少年时代》完整记录了“老何家”的悲欣往事、与吴家的几世交往。

2023年6月10日是吴石殉难73周年纪念日。这天，何迪代表何家，吴韶成之女吴红代表吴家，一同将何遂和吴石的诗画合璧之作《长江万里图》无偿捐献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实现了父辈最后的嘱托。



《长江万里图》武昌段，何遂作画，吴石题诗。

《长江万里图》何家珍藏了 80 年。这是一幅长达 66.4 米的长卷，完成于 1941 年，何遂作画，吴石在九江段、武昌段、三峡段和川江段上分别题诗四首。何达入院化疗前，将这幅画交给了何迪，要他将来与吴石后人一起捐赠给国家博物馆，以免这一珍贵文物流转之下进入拍卖市场。

何迪觉得，从这幅宏大作品中可以窥见何遂和吴石的精神世界一隅。他们骨子里都有中国传统的“侠”与“士”的精神，有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有诗词书画的逸趣横生，有苏东坡等先贤铁板铜弦的豪迈。这些先贤多曾怀才不遇，或有被误解被冤屈的经历，但从不会淡化对国家的忧思和内心的济世情怀。何遂、吴石就是在这样的传统文化滋养下，与自己所景仰的那些“武胆文心”的古代士人发生着精神共鸣，在历史关头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就如同吴石在《长江万里图》武昌段题诗中写到的：

孤心郁勃凭双剑，
共济安危托一舟。
楚客江篱无限感，
秋风斜日更添愁。

【注】：本文参考了何迪《何康的青少年时代》、郑立《冷月无声——吴石传》）

（作者：《中国新闻周刊》杂志记者。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总第 1135 期，杂志标题：追寻“老何家”往事）

城乡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刘守英 李昊泽

【摘要】：城乡不平等是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对中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有重要影响。在收入、财富、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中国城乡存在典型的不平等事实，独特体制性因素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基于权利分析视角，城乡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体制秩序转型过程中城乡权利开放的差异，以此有别于结构主义理论对城乡不平等的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权利开放推动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独特的二元体制致使农民的权利开放落后于城镇居民，进而导致二元结构加剧和城乡不平等扩大。消除城乡不平等，应摒弃单向城市化与重蹈乡建的城乡二分思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要素双向流动，通过乡村产业革命、产权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重构“人地业村”系统等方式，持续开放农民在农村和城市的权利。

引言

不平等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城乡不平等是人类社会城乡转型中最主要的表现，它是城乡在收入、消费、财富等货币维度，以及公共物品、社会福利、基本权利等非货币维度不平等的总和。经典理论认为，由于城市和乡村在社会组织方式、经济集聚效率、财富创造能力方面存在天然差别，城乡差距会伴随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而收敛。但时至今日，城乡不平等仍然是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78-2022年人均GDP以年均9.0%的速度增长，扣除价格因素，2022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比1978年分别增长17.9倍和21.2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

探究中国的城乡不平等，既要看到发展进程中二元结构的客观差异，更要重视城乡之间存在的体制因素。中国的城乡体制性不平等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在城市化加速推进中进一步加深，改革进程中城乡权利开放差异，成为城乡差距加剧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权利分析视角，分析中国城乡不平等的演变、表现与成因，阐述城乡不平等何以成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呈现了现阶段城乡在收入、财富、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不平等特征，论证了城乡权利开放差异与城乡不平等加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消除城乡不平等的政策建议。

一、城乡不平等与不平衡不充分

（一）城乡不平等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

二战以后，发展转型过程的结构问题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转型中的城乡不平等也被归因于早期阶段的二元结构：国民经济中同时存在生产率较低的传统农业部门，以及生产率较高的城市现代部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率接近于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高生产率现代部门再配置，当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人口的继续流动将使城乡劳动生产率趋于均等。伴随收入的持续增长和技术的发展，农村经济活动日益多样化，城乡的地理分割转为城乡连续体的空间形态，城乡不平等随之弱化。英美等先发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经历了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中和再分散的过程，推动了郊区化发展和农村业态丰富。日韩等东亚经济体在结构变迁过程中出现农业产值和就业份额同步下降、村落活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融合发展缓解了城乡不平等。然而，城乡不平等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依然存在，城乡收入差距高位运行、城乡工资水平和劳动报酬差距难见收敛、农业部门人力资本低下、农民贫困发生率高、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明显。

结构主义预设二元结构的收敛是人口流动和要素再配置的必然结果，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安排难以契合完全市场的假设，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动态过程中，体制因素可能对城乡不平等产生影响。城乡转型理论受到城乡二分范式的影响，将城市和乡村割裂为社会发展的两极，进而采取偏向城市牺牲农业农村的政策安排，在政府财力和城市承受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城市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将制度目标率先指向维护社会既得利益一方的权利，农民的政治权利和谈判地位更易被剥夺。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是从传统向现代的体制和秩序转型，核心是建立权利开放秩序，包括广泛开放组织设立权利、建立非人际关系化的权利规则，以及将受垄断的经济权利和超额租金扩展至全体公民。城乡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体制秩序转型过程中城乡权利开放的差异。

（二）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国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丰富，但发展质量和结构问题亟待解决。伴随发展阶段转换，人民群众的需要不再局限于简单物质文化层次和范围，他们期盼享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制约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因素，由“社会生产”扩展至整体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1. 城乡发展不平衡对中国整体发展不平衡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巨大农村人口基数的影响。尽管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 65%，但农村人口绝对数量仍高居全球第二。5 亿农村人口生活水平和发展空间明显落后于城市，整体不平等状况难以得到根本改善。第二，城乡不平等对整体不平等的影响大。整体不平等可被分解为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间不平等的加总。研究发现，1988 年以后的 30 年中，城乡间收入不平等对整体不平等的贡献率始终超过 30%，2002-2010 年间一度超过 50%，中国整体不平等与城乡不平等变动趋势一致（图 1）。第三，城乡不平等问题在多方面处于较高程度。一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仍是农村居民的 2.45 倍，而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的城乡收入比仅略高于 1，东亚经济体如日本和中国台湾为 1.2 左右，南亚经济体如菲律宾、泰国也仅为 1.6 左右。二是城乡财富不平等持续扩大。过去十多年中，城乡财富比增至近 4 倍。三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落差大。城镇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农村居民 1.3 倍，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人均支出水平分别是农村的 17 倍和 4 倍，城市低保标准高出农村 30%。四是进城农民难以平等享有在住房、教育、

医疗与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待遇，城乡不平等在城市内部形成新的二元结构并加剧社会矛盾。五是劳动生产率差异。城乡二元对比系数是一项由比较劳动生产率反映城乡不平等的综合指标，系数越低表明不平等程度越高。近年来西方发达经济体二元对比系数已超过 0.5，东亚的日本和韩国也达到 0.3 以上水平，但中国仍不足 0.25（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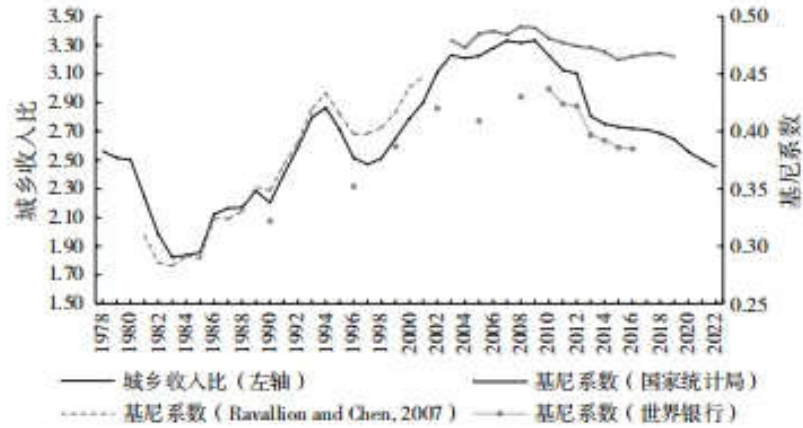


图1 城乡不平等与整体不平等变动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Ravallion and Chen (2007)^① 相关数据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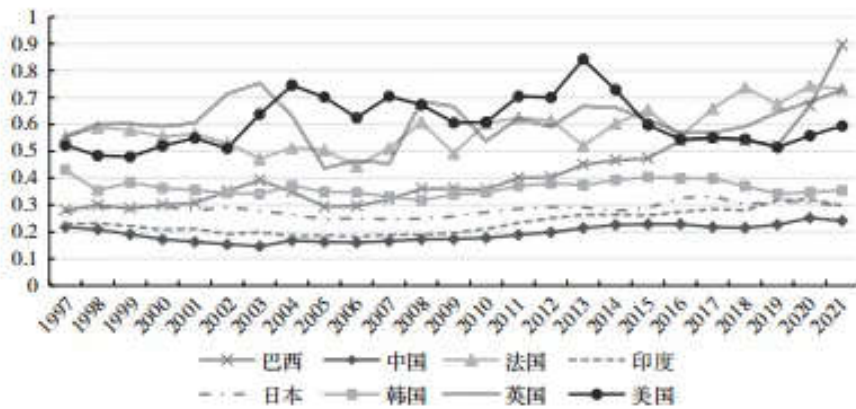


图2 各国城乡二元对比系数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

2. 农村发展不充分制约整体发展水平

第一，绝大多数贫困人口集中于农村地区。以最为宽松的居民人均收入中位数 40% 的标准作为相对贫困线，2017 年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发生率为 29.9%，高于城镇地区 27 个百分点，2020 年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仍达到 28.6%。第二，农业效率不足。2022 年中国占总就业人数 24.1% 的第一产业劳动者仅创造 7.3% 的 GDP，占比 98% 的小农户构成农业生产经营的绝对主体，农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不足非农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 25%。土地报酬不增反降。2011-2020 年三种粮食亩均总成本增长 40.6%，导致每亩净利润由 250.76 元降至 47.14 元，2016-2019 年连续 4 年粮食生产净利润为负。第三，农村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土地用途管制下乡村用地的功能缺失，对集体建设用地权利赋予和使用权利不充分，宅基地的收益、出租、抵押和转让权能残缺。土地财产权利对农民财富积累重要性下降，土地财富占农民财富份额由 21 世纪初的 30% 降至当前 10% 左右。第四，乡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以及农村留守问题加剧。

2022年末，乡村60周岁及以上、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3.8%、17.7%，分别高出城镇平均水平8.0个百分点、6.6个百分点。2010-2020年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不降反增，达到4177万人，占全国留守儿童的62.4%，农村每10名儿童就有4名留守，农村20-22岁人口高中完学率仅为55.3%，乡村发展面临人力资本的制约。

（三）城乡不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障碍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要求在主体对象上覆盖全体人民、在空间分布上实现全域富裕、在具体内容上创造物质和精神双重富裕、在发展路径上遵循分阶段和有先后的富裕。中国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些伟大成就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然而，富裕的共享在发展转型过程中存在差别，城乡不平等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障碍。一方面，共同富裕的主体既包括城镇居民，也包括全体农村居民。当前大量农村人口收入和消费水平显著落后于城市，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却对发展成果的分享不足。改革红利的释放无法惠及所有群体，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的空间既包括发达的城市地区，也包括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中国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推动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但一边是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一边却是越来越衰败的乡村。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总量不足和质量欠缺、生态文明和生活环境有待改善，农业农村现代化仍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短板。只有解决城乡全域的富裕在结构上的不平等问题，共同富裕的实现才具有可行性。

二、中国城乡不平等的典型事实

（一）城乡收入不平等

1. 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及其阶段性特征

城乡收入不平等是城乡不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类不平等结果的直接反映。整体上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启动阶段首先经历了短期快速下降，此后呈扩大趋势，近年来有所缩小。

（1）1978-1984年：城乡收入不平等阶段性缩小。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农村废除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认可并推广基层自发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由此形成的生产激励推动农业产量和农村经济超高速增长。1978-1984年短短6年间，农民人均农业生产收入由113.2元增至250.4元，经营收入占农民家庭总收入比重由27%增至80%；农民人均非农收入也快速增长，由9.4元增至64.7元。同期城市体制改革并未开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主要源自工资收入的提升，国营企业职工人均工资由644元增至1034元，奖金、津贴以及计件超额工资贡献了增加额的一半。1978-1984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以年均8.0%的速度增长，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达到14.5%，城乡收入比由1978年的2.60倍降至1984年的1.84倍。

（2）1985-2009年：城乡收入不平等扩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国企改革、工资制度多轮调整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部门生产率差异和城市经济优势在市场经济下显化。尽管这一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私营经济等非农部门转移，使工资收入占农民收入比重由17.8%增至40.0%，但是，农民无法进入城市工资水平更高的行业，城乡工资收入差距绝对值由536元增至超过1万元。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农民经营收入一度停滞，城镇居民基于多种所有制成分的经营得到广泛支持，1985年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

不足农村居民 1/7，2009 年已达到后者的 3/4。此外，社会保障制度在城镇居民中率先建立并带动转移性收入增长，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年均增长 12.4%，而农村居民转移收入增长率仅为 5.4%，城乡居民转移净收入比超过 10 倍。整体上看，这一时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速为 5.1%，而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 7.4%，城乡收入比在 1985-2009 年的 25 年间由 1.84 增至 3.33，收入差距绝对值增加到 12022 元。

(3) 2010 年后：城乡不平等有所缩小。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一系列惠农补贴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农民生产收益，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和覆盖范围逐步扩展，精准扶贫政策改善低收入农村人口的生活条件，城市大门和就业机会向农民工进一步开放。这一时期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比和转移净收入比分别由 5.6 倍和 11.2 倍下降至 3.6 倍和 2.2 倍，工资收入超过经营收入成为农村居民第一大收入来源。2010-2022 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 8.2%，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 2.5 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降至 2022 年的 2.45。但是，由于城乡差距过高的基数效应，加之除经营净收入以外的其他城镇居民收入均为农民的 2 倍以上，尤其是城镇居民财产净收入始终是农民的 10 倍以上，城乡收入差距仍扩大至 29150 元。

2. 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结构及其影响

2021 年，农村居民最高的前 20% 群体人均收入（43082 元）仍不及城镇居民平均水平（47412 元），农村后 20% 低收入户收入更是仅有城镇前 20% 高收入户人均收入的 4.28%。从结构上看，城乡整体收入不平等实际反映了劳动收入、资本收入等各类收入不平等的总体影响，不平等的扩大往往来源于收入构成的多方面（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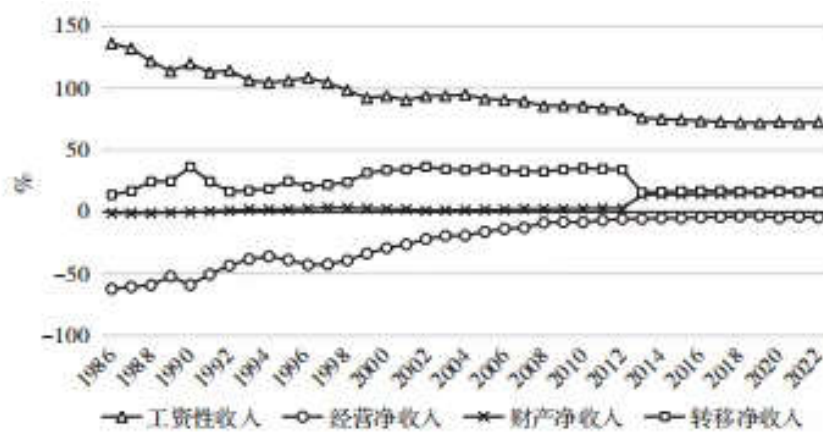


图 3 城乡居民分项收入对城乡整体收入不平等的贡献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计算。

(1) 工资收入不平等是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来源。工资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近 10 年来仍维持在 70% 以上。城乡工资收入不平等主要受就业结构、人力资本差异以及制度歧视等方面影响。其一，城乡居民就业结构差异。2021 年城镇居民在公有制单位如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就业占比为 18%，其他非公有部门就业的雇员占比为 62%；而农村居民在公有制单位就业比重仅为 1.2%，在非公有部门就业的雇员占比为 42.2%，常住从业人员中近一半从事第一产业。其二，城乡居民人力资本差异。2021 年调查的农村家庭中，户主受教育水平未到初中的占比超过 30%，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不及

14%，而城镇家庭户主两项比例分别为 10.5%和 54%。由于全国薪资排名较高的信息服务业、科学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等大专及以上学历就业人口超过 70%，受教育水平限制了农民进入高收入行业。其三，制度性歧视。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来自城乡流动过程中的农民工就业，然而，户籍歧视导致的收入不平等问題长时期存在。

(2) 经营收入在缩小城乡不平等中的作用下降。在城乡居民四项收入中，经营收入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负。1986 年，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约是城镇居民的 30 倍，对缩小城乡不平等的贡献为 62.2%。然而，自 2008 年起这一贡献下降为 10%以内，2016 年以来贡献率下降至 5%以内。从收入结构看，2021 年城镇居民三次产业经营收入占比分别为 10.5%、14.0%和 74.6%，而农村居民三项占比分别为 74.9%、5.3%和 15.9%。农民经营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产业经营占比过高，而近年来农业生产利润率受成本提升等影响持续下降。例如，2013-2020 年，三种粮食生产每亩净利润由 72.94 元降至 47.14 元，成本利润率由 7.11%降至 4.21%。相较而言，城镇自营者在享受到更充分的所有制和市场化改革红利后，城镇居民二、三产业经营收入快速增长。

(3) 非劳动收入差距对不平等的影响扩大。根据功能性收入分配相关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收入在收入中的占比提升，由于财产收入与财富积累相互促进，存在“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资本收入不平等往往高于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近年来中国城乡居民财产净收入比一直维持在 10 以上，是所有收入构成中最不平等的部分。即使排除城乡自有住房折算租金的巨大差异，城乡居民在股息红利以及出租房屋的财产性收入仍存在较大差距。农民土地财产权不完整和保障不充分、城乡住房市场化水平的巨大差别等，是导致农村居民财产积累权和收益权严重受限的主要原因。例如，根据浙江省的数据，城镇居民 2018-2020 年的人均股息红利收入在 1000 元以上，而农村居民的上述收入仅为 200 元左右，城乡居民人均出租房屋收入差距在 2000 元左右。在非劳动收入中，另一项差距悬殊的收入源自养老金或离退休金等转移性收入。2017 年调查的农村居民人均养老金或离退休金为 809 元，占其转移性收入 26.4%，占全部可支配收入的 6%；同年城镇居民养老金或离退休金为 7431 元，约是农村居民水平 10 倍，占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的 84.9%，占其总收入的 20.4%。

(二) 城乡财富积累不平等

1. 城乡财富不平等问題加剧

家庭福利和预期收益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这包括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后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家庭财富，财富积累和分配情况是收入之外影响家庭生活水平的另一重要因素。中国城乡居民财富构成不同、积累与增值机制有别、取得财产方式通路不一，导致转型进程中城乡财富不平等问題逐渐显现。中国居民财富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还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城乡居民人均财富约为 1 万元左右，城乡财富比值也仅为 1.3 倍。此后的市场化改革和私营经济发展推动国民财富迅速积累，中国私人财富价值在 1978 年与国民收入相当，但 2015 年已是国民收入的 4.5 倍，其占国民财富比重由三成增至七成。财富积累的同时出现分配失衡问題，2015 年中国最富有的前 10%群体占有社会 67.4%的财富。城乡不平等成为影响中国整体财富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农民一方面缺少在城市积累财富的通路，另一方面农村住房和土地市场的权利残缺限制了农民财富的增值。自 2010 年以后城乡财产差距大幅增长。2012 年城乡收入和财富比值相当，分别为 3.10 和 3.13，2020 年城乡收入比缩小至 2.56，但城镇居民人均财富增至农村居民的 3.77 倍，财富差距绝对值增加一倍以上（表 1）。

表1 城乡居民财富不平等变动情况

年份	数据来源	城镇家庭人均财富(元)	农村家庭人均财富(元)	城乡财富差(元)	城乡财富比
1995	CHIP	13593	10444	3150	1.30
2002	CHIP	43632	15654	27977	2.79
2012	CFPS	172838	55267	117571	3.13
2014	CFPS	210065	68202	141863	3.08
2016	CFPS	278589	67013	211575	4.16
2018	CFPS	329303	98449	230854	3.34
2020	CFPS	379970	100719	279251	3.77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相关数据计算。^④

2. 城乡住房财富不平等是财富不平等的主要表现

住房资产在中国居民财富构成中占据最重要比重，但城乡住房市场分割和二元住房土地制度使得城乡居民住房财富价值差异巨大，住房财富不平等成为城乡财富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住房市场并不存在，城镇住房产权公有，对城镇职工实行低租金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农村家庭住房依宅基地而建，宅基地归生产队所有。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住房市场分别朝向权利开放和限制的反方向发展，90年代城镇开启住房市场化改革，城镇居民逐步获得住房私有产权，农民却被限制购买城市住房。1998-2002年，80%的城市公共住房以低价卖给城镇居民，形成住房产权初次分配的不平等。

2003年以后，房地产被确立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政府利用独特土地制度对城市商住用地实行“限量保价”供给模式，城市住房价格快速上涨，带来城市居民家庭财富扩张。在农村地区，由于1999年以后非集体成员宅基地使用权被关闭，农村住房财富难以形成正规市场化定价，农宅财富价值增长缓慢。与此同时，农民前往城市打工获取非农收入，但他们在城市积累的资本只能回村盖房。以上因素导致城乡住房财富差距逐步拉大，1995-2020年，城乡居民住房财富比由1.70快速增长至3.96（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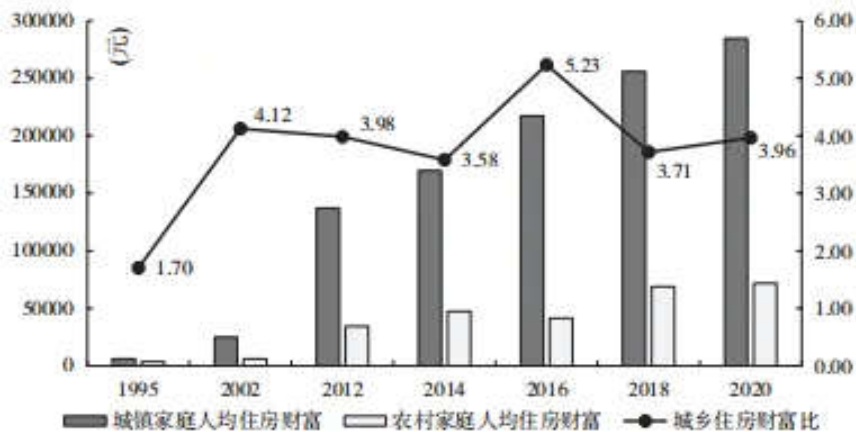


图4 城乡住房财富不平等演变（1995—2020）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相关数据计算。

3. 城乡居民金融资产差异扩大

城乡居民在住房以外的财富构成中存在较大差异（表2）。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推进，城镇居民配置金融资产投向各类金融产品，而农村地区长期处于金融抑制状态，农民将更多资产配置于收益较低的银行存款。城镇居民人均金融资产由1995年的3910元增至2020年的59457元，而农村居民2020年人

均金融资产仅为 14792 元。到了 2018 年，城镇居民人均活期定期存款总额为 34118 元，占其金融总资产的 78%；农村居民存款总额达到 16716 元，占金融总资产比重超过 85%。从其他金融资产结构看，城镇居民人均股票、基金和国债资产分别为 685 元、512 元和 317 元，分别是农村居民的 21、23 和 26 倍。农村金融资产主要是风险低、收益低的存款，很少进行存款以外的投资。投资差异使得城乡财富差距继续扩大。

4. 城乡土地财富分享不平等

乡土社会向城乡中国的转型带来土地财富价值的迅速上升。然而，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政府“以地谋发展”模式使土地难以成为农民的财富来源。

一是土地资本化过程的级差收益主要被城市攫取，农民未参与分享。1998 年《土地管理法》明确农地转用一律实行征收、国家依法实施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2003 年开始推行经营性用地招拍挂出让方式。土地制度安排保证了土地向城市的转换效率、满足政府以土地资本化获得收入和发展经济的需求。2001-2010 年，招拍挂出让面积占土地出让面积比重由 7.3% 增至 88.3%，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由 2003 年的 5421 亿元增至 2021 年的 87052 亿元。然而，土地资本化过程中农民只能获得基于地上附着物的数倍原用途补偿，土地转用过程的级差收益被地方政府捕获并主要用于发展城市。二是农村土地财产权利缺失。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后，农村土地进入非农集体建设使用的渠道逐步收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大多数地区合法入市的通道基本关闭。农民利用集体土地从事非农建设的权利被剥夺，乡村非农经济活动萎缩，土地财富创造能力减弱。另一方面，农民虽然依成员资格无偿取得了对宅基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但收益权、出租权、抵押和转让权的产权残缺。宅基地的财产属性弱化，不允许市场化交易，导致农民的土地及附着于其上的住房财富难以显化。数据显示，农民土地价值的财富占比持续降低，由 1995 年的 34.0%，降至 2020 年的 10.9%（表 2）。

表 2 城乡居民财富分布占比

	年份	数据来源	净房产 (%)	金融资产 (%)	土地价值 (%)	其他 (%)
城镇居民	1995	CHIP	44.58	28.77	0.00	26.65
	2002	CHIP	57.25	31.82	0.00	10.94
	2012	CFPS	79.31	11.13	1.89	7.66
	2014	CFPS	80.83	11.52	1.30	6.34
	2016	CFPS	78.03	12.37	1.10	8.49
	2018	CFPS	77.71	13.21	0.97	8.12
	2020	CFPS	74.87	15.65	0.88	8.60
农村居民	1995	CHIP	34.07	11.45	33.96	20.52
	2002	CHIP	38.71	12.24	31.13	17.91
	2012	CFPS	62.28	9.70	19.41	8.61
	2014	CFPS	69.53	9.33	15.22	5.92
	2016	CFPS	62.00	12.62	14.75	10.63
	2018	CFPS	70.00	11.71	8.94	9.34
	2020	CFPS	71.28	14.69	10.89	3.15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相关数据计算。

（三）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不平等

1. 城乡基础设施供给水平存在差距

提高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水平是改善农民生活、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21 世纪以来，中国进入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阶段，农林水事务支出由 2007 年的 3404.70 亿元增至 2012 年的 11973.9 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持续提升，根据两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2006-2016 年全国通公路、通电、通电话、安装有线电视的村占全部村比重，分别由 95.5% 增至 99.3%、98.7% 增至 99.7%、97.6% 增至 99.5%、57.4% 增至 82.8%。“十三五”期间，行政村、贫困村、“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通宽带比例分别从不足 70%、62% 和 26% 提升到 100%。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9.2%，城乡普及率差异缩小了 15 个百分点。

尽管农村基础设施硬件水平得到改善，但是基础设施供给差异带来的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仍存在差距，且呈现明显的“城市—县城—镇—乡”递减现象（表 3）。从日常生活设施看，城乡居民燃气普及率差异超过 60 个百分点、污水处理率差异超过 70 个百分点，且仍有 15% 的农村地区未享受集中供水。农村和建制镇排水管道密度仅为城市水平的一半左右，农村地区绿化覆盖率仅为城市水平的约 1/3。

表 3 2021 年区域基础设施供给差异

	城市	县城	建制镇	乡
燃气普及率 (%)	98.04	90.32	58.93	33.63
污水处理率 (%)	97.90	97.89	61.95	26.97
供水普及率 (%)	99.38	97.42	90.27	85.33
排水管道密度 (公里/平方公里)	12.00	10.11	7.54	7.53
绿化覆盖率 (%)	42.42	38.30	16.98	15.16

数据来源：《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2. 城乡居民受教育权利不平等

城乡教育公共服务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方面，对城乡居民未来职业选择和经济收入产生基础性影响。2004 年起，国家开始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实行免学杂费、教科书费的“两免一补”政策，此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2009 年农村中小學生人均公用经费为 500 元和 300 元，农村学生享受到更多受教育权利。城乡小学和初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差异由 2002 年的 1.6 倍以上降至 2019 年的 1.1 倍左右。

但是，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等问题依然存在。尽管 2012-2020 年，全国农村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发展费支出、农村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分别增长 85.77% 和 48.37%，但两项支出增速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2020 年，农村 6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6.76 年增至 7.92 年，增速快于同期城市人口，但城乡受教育年限差距扩大至 2.47 年，且过去 10 年农村居民教育程度增长速度下降（表 4）。城乡人力资本差异成为农民进一步提高经济收入、实现代际间收入跃升的阻碍。

表 4 历次人口普查城乡 6 岁及以上居民受教育年限

年份	城镇居民 (年)	农村居民 (年)	城乡受教育年限差 (年)	城乡受教育年限比
2000	9.06	6.76	2.30	1.34
2010	9.98	7.58	2.40	1.32
2020	10.39	7.92	2.47	1.31

数据来源：根据全国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受教育年限根据不同教育程度居民占比乘以其对应的折算标准计算得出，具体的折算标准为：文盲=0 年，小学=6 年，初中=9 年，高中=12 年，大专及以上=16 年。

3. 城乡基本社会保障水平不一致

养老和医疗保障是居民基本社会权利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改革初始阶段，社会保障服务对象主要为在城镇单位就业的职工。中国政府于 1986 年启动国营企业职工劳动合同保障制度，城镇职工开始享有退休费、医疗费、救济费等退休金待遇。1997 年至 1998 年，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保障范围逐步扩大到城镇所有企业及其职工，2001 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职工超过 1 亿人。然而，直到 21 世纪初，农村地区才开始实行“新农合”“新农保”制度，农村人口社会保障实现从无到有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逐步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农民享有的基本社会权利进一步提升。

然而时至今日，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和权利不平等依然存在。具体表现为，农民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的保障待遇与城镇职工差距巨大。2012-2022 年，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人均月支出由 71.6 元增至 204.7 元，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人均月支出是前者的 17 倍，人均月支出差异超过 3400 元（表 5），且国家城职保个人账户记账利率高出各地城乡保 3 个百分点左右。从医疗保障看，尽管农村医疗服务覆盖面已大大提高，但医疗资源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与城市地区仍有较大差距。城市每千人口享有的各类医疗服务人员数量是农村地区的 1.5 倍以上（表 6）。城乡居民在医疗保险的参与项目和保障金额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平等。2021 年，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 1.01 亿人，全年医保基金支出为 9296.37 亿元；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为 35431 万人，但医保基金支出达到 14746.73 亿元，人均医保基金人均支出水平是城乡医保的 4 倍。

表 5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年份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月人均支出（元）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月人均支出（元）	城乡待遇比	城乡待遇差（元）
2012	1741.7	71.6	24.3	1670.1
2013	1914.2	79.6	24.1	1834.6
2014	2109.6	91.5	23.1	2018.1
2015	2353.0	119.2	19.7	2233.8
2016	2627.3	117.4	22.4	2510.0
2017	2876.0	126.7	22.7	2749.2
2018	3153.5	152.3	20.7	3001.2
2019	3332.4	161.9	20.6	3170.5
2020	3349.8	174.0	19.3	3175.8
2021	3577.4	190.9	18.7	3386.5
2022	3605.4	204.7	17.6	3400.7

表 6 城乡每千人口医疗资源

年份	卫生技术人员（人）		执业（助理）医师（人）		注册护士（人）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个）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2013	9.18	3.64	3.39	1.48	4.00	1.22	7.36	3.35
2014	9.70	3.77	3.54	1.51	4.30	1.31	7.84	3.54
2015	10.21	3.90	3.72	1.55	4.58	1.39	8.27	3.71
2016	10.42	4.08	3.79	1.61	4.75	1.50	8.41	3.91
2017	10.87	4.28	3.97	1.68	5.01	1.62	8.75	4.19
2018	10.91	4.63	4.01	1.82	5.08	1.80	8.70	4.56
2019	11.10	4.96	4.10	1.96	5.22	1.99	8.78	4.81
2020	11.46	5.18	4.25	2.06	5.40	2.10	8.81	4.95
2021	9.87	6.27	3.73	2.42	4.58	2.64	7.47	6.01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2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三、中国城乡不平等的独特性

传统发展理论将现代化转型局限于二元经济转为一元经济的过程，忽视了转型进程中更为根本的转型：即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转型。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结构非常独特，体制也非常独特。现代化推进至今，不仅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而且独特的城乡二元体制反而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进而加大了城乡不平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通过主体开放、市场开放和利益开放实现了经济绩效的提高，然而，中国式权利开放并未根本改革二元体制结构，反而是这种固化的结构被进一步强化，城乡权利开放差异进一步加大了城乡不平等。

（一）城乡二元体制性差异与城乡权利不平等

1. 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与城乡不平等

（1）建立二元体制的目的是优先发展城市和推进国家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一穷二白的社会面貌、薄弱的国民经济以及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成为稳定政权和实现赶超战略的选择。国家通过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管制建立起整体性体制秩序，通过牺牲农业农村利益的制度设计将生产要素集中配置于城市和工业部门，形成城乡二元体制。一是通过农业集体化实现对乡村生产要素的控制。分散而落后的小农生产难以满足为工业化发展提供资本积累的战略目标，国家以强力制度介入乡村基层组织并进行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改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成为农村基本制度，通过将生产、经营、居住等乡村经济活动权利收于国家、公社、大队、小队等各层级，集体制度取代家庭经济制度成为乡村基层体制的微观基础。二是以扭曲价格和保护政策向城市输送经济剩余。为保障工业化低成本运行，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收购依政府制定的价格统一执行，粮食供给由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社垄断。国家通过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工业化的要素投入成本，以非市场的制度安排攫取农业生产剩余，以工农产品“剪刀差”方式将其向工业部门输送。三是建立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为保障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于优先发展的部门，政府将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投向城市，农民承担为城市提供低价农产品的义务。

（2）关闭农村地区发展工业和农民进入城市的权利。为了保证国家工业化的推进，防止农村与城市争夺资源和发展权利，国家关闭了农村参与工业化的权利和农民进入城市的权利。一是利用人民公社制度控制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农民失去经济自由和从事非农活动权利，他们只能服从计划在农村地区从事所规定的农业经济活动。二是“以粮为纲”方针的实施将土地和乡村功能转化为粮食生产，限制土地参与多种经营和工业化的权利。三是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业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以户籍藩篱将农民禁锢于乡村。

2. 改革以来二元体制的强化加大城乡不平等

中国的改革推动了传统计划集权体制由限制性权利秩序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变，农民也逐步摆脱各类体制束缚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权利。然而，改革并未撼动城乡二元体制，在关键领域反而被进一步加深，独特的二元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成为加剧城乡权利不平等的重要方面。

（1）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与土地权利不平等。中国在土地城乡再配置中，建立起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二元土地所有制架构。二元土地制度不仅促进土地从农用向非农用的配置，而且扮演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角色，成为城市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但是，二元土地制度下的城乡二元土地权利体系导致集体土地权能弱化和农民土地权利受损。一是城乡二元土地权利体系。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分属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受不同法律约束，国家对两种不同属性土地进行差别化赋权。城市建设用地

允许机构和个人拥有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抵押权等权能，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农地转用后土地所有者权利随之消失。二是城乡二元土地配置方式。国家逐渐关闭农地进入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的通道，农村集体土地必须经过政府征用转为非农用地才能进入土地市场，集体土地非农建设权利被剥夺。国有经营性土地市场由城市政府独家垄断，以土地出让为代表的土地财政和土地抵押为代表的土地金融制度成为地方经济发展主要资本来源，农村土地成为城市空间扩张的“蓄水池”。三是城市政府捕获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式。农地转为非农用地实行政府征收制度，城市政府控制了土地征用和出让的垄断权利，支付给农民被征用的土地补偿遵循原用途补偿原则，高额的土地出让收益由城市政府捕获。宅基地制度朝向弱化产权和强化管制方向发展，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拥有者只有占有和使用而没有收益权利，宅基地逐步失去出租、转让和抵押等权能，弱化了农户财产权利交易和市场化配置宅基地的通道。

(2)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与农民城市权利的不充分。户籍制度是我国特有的限制人口流动的正式制度，以户口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依据进行社会管理，导致中国农村与城市居民在自由迁徙、经济活动参与、公共服务享有等方面的权利分割。中国经历了超大规模的城乡劳动力流动和跨地区迁移，但城乡不平等问题未能伴随劳动力流动而消失，反而在城市化率最快时期更加严重。尽管限制人口迁移的显性安排逐步松动，但依附于户籍的隐性制度安排造成对农民各项权利的排斥，甚至在城市内部形成新的二元结构。一是农民在城市的经济地位不平等。其一，当城市就业市场波动时，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往往被视为城市居民就业的“竞争者”而被歧视性对待。其二，因为户籍制度致使农民处于相对弱势的就业地位。农民工经常从事城里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过度和重度劳动比例均高于城镇职工，但劳动报酬往往难以公正反映其劳动贡献。1999年《失业保险条例》仅针对城镇企事业单位失业人员，农民合同制工人失业仅能获取一次性生活补助。二是附着于户籍制度的身份权利差异加大。其一，户籍人口作为城市管理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实际依据，大量农民工未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导致其在城市的生存成本和风险偏高。其二，农民无法落脚城市。城市扩张形成的城中村、城乡接合部虽然降低农民的城市居住成本，却也使居住于这些社区的农民生活在流动人口内部圈子和有限的公共空间中，与城市社会缺乏联系。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的他们不被城市社会认可，也失去跨越阶层的权利和机会。其三，许多未改变户口性质的农民只是因区划变动或城市扩张而被动计入城镇居民，但他们并未摆脱农业经济活动和农村生活方式。对于那些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常住农民工，由于面临租赁合同不稳定、基础设施缺乏、卫生环境较差等问题，他们更像是城市的匆匆过客而难以定居，返乡和回村仍是他们的最终归宿。

(二) 城乡权利开放差异加剧城乡不平等

权利决定了微观个体的行为选择能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以及分享经济收益的机会能力，权利结构变动带来城乡居民发展水平和福利变化差异。中国改革进程中城乡权利开放程度和强度不一，且城市权利开放程度在多数时期高于农村地区，城乡权利开放差异导致城乡不平等拉大。

1. 城乡经济活动权利开放差异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采取渐进方式，经济权利开放率先在阻力较小的农村地区启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承包土地的自主经营权和剩余支配权，并通过提高收购价格和允许多种经营开放农民经济收益权利，城乡不平等出现短暂缓解。随着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城乡经济活动权利开放出现分化。一是城市国企改革通过建构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制改造不断下放权利，逐步实现产权关系的多元化与明晰

化，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得到改善。农村土地改革制度红利释放完毕，应对农业经营等新问题的改革滞后。农地承包权的继承、退出权能缺乏，关于经营权的法律界定和保护不明朗，行政权侵犯农民承包地的情形时有发生，农业经营受到土地细碎化和流转不畅制约。二是改革赋予非公有制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新的经济组织准入权扩展并吸纳大量城市就业，工资制度改革使市场竞争成为决定工资水平和激励劳动者的主要机制，针对城市待业和失业者的公共服务和保障政策设立。在农村地区，乡镇企业一度成为农村非农经济权利开放的主战场，但随后国家逐渐收窄集体土地参与非农建设的权利，导致乡村经济活动萎缩。

2. 城乡财产权利开放差异

财产权利的重要性在所有制改革和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凸显，但对农民财产的界定、赋权与保护不足，对农村要素市场的开放滞后，导致农民的财产权利开放受限。一是农村土地财产权利残缺、土地市场化程度有限。城市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法律形式确立，国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实现两权分离，城市土地使用权的财产属性显化，城市政府通过土地出让和抵押等方式创造了巨额财富。农村土地财产权利开放被抑制，农地经营权抵押与担保权缺乏法律保障，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无法合法入市，土地用途转化后的财产收益与农民无缘。农民拥有宅基地的使用权而缺乏完整财产权利，宅基地的转让、出租、抵押等财产权能缺失，限制了农村土地资本化能力和农民财产收入的提高。二是城乡住房财产权利开放出现差异。1988 年起国家开始以低价和税收优惠向“家住城镇、有正式城镇户口的职工”出售公有旧住房，形成城乡住房产权初次分配的不平等。1998 年住房市场化改革正式启动，城镇职工可通过工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和地方住房补贴等形式购房，但并未向农民开放城市购房权利。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难以通过购房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其在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用于返乡购房建房并在农村形成大量的闲置资本，进而造成城乡住房财产积累和收益权的分化。

3. 城乡基本社会权利开放差异

受制于发展战略和公共品提供能力，城乡基本社会权利开放出现时序和程度上的差异。一是农民享有的公共服务权利不足。其一，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长期存在各级政府投入责任不明确、经费供需矛盾、农村家庭教育负担过重等问题，农村居民受教育权利受限。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以及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扭转了乡村教育困境，但城乡各级生均教育经费和教育资源供给质量仍存在差距。其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落后于城市。市场化改革初期商业银行逐步从农村退出，农村金融网点大量撤并，导致农村资金外流和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农村道路、燃气、供水、绿化等设施建设滞后，制约了乡村环境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权利的取得先于农村居民。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与生育保险政策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十年中相继启动并逐步完善，保障成员范围由国有单位扩展至非公有经济部门。农村地区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探索建立的合作医疗进展困难、参与率过低，同期开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 1999 年被国家叫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分别于 2003 年和 2009 年开启试点，于 2007 年和 2012 年才在全国范围铺开，落后城市社保制度十余年。城乡统筹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尽管建立，但参与者多为农村居民，其保障待遇与城镇职工保险差距巨大。

4. 农民城市权利分享不足

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但由于农民仍缺失市民化权利，在城市内部形成新的二元权利结构。一是农民城市就业权利不平等。伴随城市化和沿海工业化快速发展，国家逐渐放松中小城

市户籍管制，农民实现离土出村并在城市就业。然而，隐性制度歧视导致的就业权利不平等依旧存在，以户口为基础的职业隔离使农民工聚集于低收入回报的岗位；为保证本地居民就业，一些城市制定了外来人口的行业、工种限制办法，以及企业使用本地工的硬性比例。由于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以及工资歧视问题，农民工收入低于城镇职工，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二是农民未享有城市基本社会权利。农民通过跨区域流动进入城市，但城市权利基本只赋予本地市民。农民工难以享有城镇住房保障政策，大多居住于面积狭小、设施不完善的租赁住房 and 职工宿舍，城市居住权利的缺失导致难以长期在城市落脚。约三成农民工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非正规就业人员，职工社保缴纳比率远低于城镇职工，并面临拖欠或克扣工资问题。农民工参与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工伤和失业保险的比率较低，子女在城市的受教育权受限，仍有不少随迁子女在初中毕业后无法继续在城市高中就读。

四、消除城乡不平等的政策建议

（一）从城乡二分到城乡融合

城乡二分范式将社会划分为城市和乡村两大阵营，形成以城市化为目标的城市主义和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乡村主义两大极化的发展观，造成的结果是重视发展城市而忽视乡村的歧视和贫困问题，乡村始终处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在城乡转型过程中，首先应当摒弃单向城市化与重蹈乡建的城乡二分思维，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重视保障农民和农村的利益，推动城乡间要素双向流动和经济社会互动，以城乡融合化解不平等问题。政策方向应聚焦于探索不同区域城乡融合的路径，在都市圈形成跨尺度的“城区—郊区—县城—城镇—村”的城乡连续体，大城市形成“城区—郊区—乡村”的城乡连续体，以县城为枢纽，形成连接城乡的城乡融合空间。

（二）进一步开放农民城市权利

农民城市权利的缺失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不平等扩大的主要原因，能否妥善解决农民入城的平权问题，关系着近3亿流动人口的的未来。由“农二代”引发的代际革命推动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他们呈现出入城不回村的倾向，在生活和经济方式趋于城市的特征，却面临融入度不足和不被城市接纳的困境，无法形成在城市长期稳定生活的预期。解决“农二代”问题的关键是保障其城市居住权，应开放农民购房以外的平等享有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的权利，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市场，以城市周边和城中村集体土地入市加大住房土地供给。更进一步地开放“农三代”的入城权利。“农三代”受教育权的不完整阻碍了他们的入城选择和未来发展空间，应着力解决城乡教育不公平，推动实现公办学校尤其是高中入学权利向随迁子女开放，切实维护“农三代”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三）以乡村产业革命解决农村发展不充分

中国乡村的产业革命道路应该农业工业化和农业精致化二者并行。一是农业工业化的实质是通过土地、资本、劳动、机械等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持续升级，实现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和规模报酬的递增。其一，实行“一县一业”主导产业培育，推进产业规模化和服务规模化。其二，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建立加工、冷藏、技术研发、市场、品牌等成体系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其三，推进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重组与升级，推动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以土地三权分置培育新农业经营者，对闲置低效利用土地进行收购、整理和发包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农业机械利用效率。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匹配度。其四，提高农业回报水平，实现农业单位土地利用效率和报酬提升。二是正视中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特点，以村镇为单位发展精致农业，集中挖掘和培育本地区特色和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实现农产品由土向特转变，建立产品标准和培育公共品牌，提高农产品复杂度和地方知识含量，提升农

产品价值和农业竞争力。

（四）提高农民财产权利缩小城乡财富不平等

土地是农民的财富之母，提高农民财产权利的核心是城乡土地平权和给予乡村土地更多的发展权利。一是改革征地制度，保障农民在土地开发和转用过程中的财产权利，减少强制低价征地对农民土地权益的损害，形成土地级差收益在国家、集体和农民间的公平分配。二是实现城市国有建设用地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权利平等，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前提下，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保障集体建设用地享有抵押、出租和转让的权利。开放农民和集体组织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参与非农建设的通道，完善吸引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参与集体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的政策措施。三是赋予农民宅基地完整的财产权利，推动宅基地流转和整合，盘活闲置宅基地，构建宅基地有偿使用与退出制度，探索宅基地多元化使用方式，显化宅基地及附着房屋的财产价值。四是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机制建设，唤醒沉睡的集体资产。四是确保农民跟城里人一样可以在城市积累财富，缩小因城乡居民住房财富积累制度性差异导致的财富鸿沟。

（五）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消除城乡居民基本社会权利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打破二元体制的核心是提升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和农民社会保障权利。一是补齐乡村基础设施投资短板，推动农村地区在供水供气、污水处理、环境绿化等方面设施供给，因地制宜建设相关生活性设施，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二是提高乡村卫生健康服务水平。加强乡村卫生人才资源的培育和引进，科学制定基层卫生服务人员的培养和补贴政策，增强乡村卫生室便捷服务程度。三是提升乡村教育水平。扩大教育经费向乡村的倾斜幅度，持续改善乡村办学环境，加大对义务教育优秀教师和退休教师赴乡村任教的支持和补贴。四是完善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项目机制，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提高农村养老金覆盖范围和发放标准，完善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政策。五是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推动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同常住人口挂钩、由常住地供给的机制，加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转移支付，稳步提高非户籍常住人口在流入地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数量和质量。

（六）推动“人地业村”系统重构

中国传统乡村的秩序结构是农民、农业和农地在村落的地理范围和经济空间内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口大规模转移没有带来人地关系的根本松动，回村城市化模式导致耕地和宅基地碎片化和村落无序扩张，小农经济固化导致乡村产业回报率低下，“人地业”系统失衡造成村庄破败和乡村功能转型困难。缩小城乡不平等，需要推动从人到地到业到村的系统性重构。一是重新焕发乡村人气。在人口流入村关注流入人口平权问题，人口流出村关注人的归宿和村庄人气提升。二是解决乡村土地碎片化问题，通过耕地、宅基地整合实现乡村土地成片化。三是以土地规模化、产业规模化和产品精致化持续提升农业回报率，培育本地有竞争力的产业。四是基于人、地、业的动态变化重塑村落形态和空间，使村庄具有历史、文化、情感和记忆功能，让“农一代”在乡村体面老去，让乡村成为“农二代”的诗和远方、成为城市居民的精神驿站。

（作者：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昊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来源：《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大食物观——国情的农业推理

张蓝水

【摘要】：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立足我国国情，人多地少资源禀赋”建设农业强国，及前不久赴广东省调研，深刻体会大食物观的逻辑性和必然性。

【关键词】：国情 人多地少 农业经济学 大食物观

党的二十大之后，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去年1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深刻论述了农业强国内涵：“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我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所谓共同特征，就是要遵循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立足我国国情，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走自己的路，不简单照搬国外现代化农业强国模式。”对“中国特色”，他指出五个主要方面：一是依靠自己力量端牢饭碗；二是依托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农业；三是发展生态低碳农业；四是赓续农耕文明；五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为此，他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要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等三项重要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他对大食物观作了全面深刻地论述：“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树立大食物观。‘吃饭’不仅仅是消费粮食，肉蛋奶、果菜鱼、菌菇笋等样样都是美食。耕地以外，我国还有40多亿亩林地、近40亿亩草地和大量的江河湖海等资源。要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在保护好生态环境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设施农业大有可为，要发展日光温室、植物工厂和集约化畜禽养殖，推进陆基和深远海养殖渔场建设，拓宽农业生产空间领域。”

上篇“蓝水流觞”《普及践行大食物观》从党的二十大战略决策和中央政策角度阐述了大食物观问题。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以及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岸线首屈一指的广东省海洋经济的考察调研实践，特别是涉及“大食物观”和“大农业经济”的内容，引发我们从国情、农情的角度对大食物观作进一步学习与思考，从国情、农情的自然推理上，进一步领会“大食物观”，深刻体会国民生活走向大食物观的逻辑性和必然性。

我国地处亚洲东部。有 960 万平方千米陆域和 300 万平方千米海域国土面积。陆域海拔高度呈西北高、东南低。1935 年，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提出我国人口密度的地理分界线（黑龙江省瑷琿与云南省腾冲的连线），初称“瑷琿—腾冲线”，后因地名变迁，近称“黑河—腾冲线”即胡焕庸线。当时瑷琿—腾冲线东侧面积占全国 36%、人口却占全国 96%；而占全国 64%陆地面积的西侧，人口却只占全国的 4%。二战之后，外蒙、台湾变动，东侧陆地面积变为 43.18%，人口变为 93.68%。西侧面积极变为 56.82%，人口变为 6.32%。

我国东南部处二、三阶梯，以平原、丘陵为主，农产业以耕作业为主。西北处一、二阶梯，多高山、高原，农产业以畜牧业为主。

影响人口分布的重要因素，一是地形，二是气候，进而影响人的生活环境和生产能力，制约人类活动与文明的空间拓展。社会历史条件在客观上也对人口分布产生一定影响，该线也是认识东西部差异和理解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把钥匙。

我国南北跨越 50 多个纬度，具有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等多种类型。降水量从东南沿海向西北递减，形成湿润区、半湿润区、半干旱区、干旱区。南方雨量充沛，适宜发展稻作农业；北方降水少，适宜发展旱作农业。西北干旱区高大山体的水汽凝聚作用形成河流，生出山前灌溉农业。

我国耕地面积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 9%，淡水资源占世界的 6%，养育着约占 1/5 的世界人口。历史形成的我国耕地少、淡水少、人口多是我国涉及农业的资源禀赋，是影响农业的重要“国情”，亦称“农情”。

我国长期处封建社会，农耕文明在保障供给、保护生态、传承文化、就业增收等方面对社会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受历史局限，由于长途交通运输工具不发达，直接影响着国内外大范围的商贸往来和陆地和海域生活的农人都可以按需享用到海—陆农产品。因此，那时的人们长期过着消费品单一的贫乏生活，形成“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方式，造成那个时代“在土里刨食吃”的农民和“靠捕鱼过活”渔民的这种身份差异。某地域一但闹饥荒（最典型的是粮食欠收），灾区一家家老小离乡背井，外出逃荒、要饭，成为农耕社会司空见惯的悲剧。

二

我国农业资源禀赋主要问题是耕地少、人口多，致使陆地区域人均耕地难以维持农户家庭温饱。但是，耕地农业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农业。耕地农产品现在已经发展到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包括棉花、桑蚕、苧麻等纤维产品和茶叶、药材等）、饲料作物（包括猪、马牛羊、家禽和家庭宠物的精料）、蔬菜瓜果类作物等。粮食作物和蔬菜瓜果类作物，以及油料、薯类等的产品是人的主要植物类食物。以上几乎涵盖了传统陆基小农户农业的全部概念，耕地农业最根本的还是粮食作物，可以说是陆地农民的命根子。农家耕地少，传统农业社会，农业产出往往满足不了小农户农民正常生存需要，难以维持家庭温饱，致使许多农户在贫困线挣扎。遇到灾荒之年常常造成农民的大量死亡。对陆地农民来说，粮食安全是第一位的要事，提升粮食产能仍然是耕地农业的首要任务，“国之大事”！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和国家提出的，在建党百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实现，极大地提升了农民家庭的安全感、幸福感。

在充分发挥现有耕地资源功能，发展种子产业、提高农作物单产和产成品质量，作为国家层面，走向食物多元化，就要大力发展非耕地资源农业。习近平总书记提醒我们，耕地以外，我国还有 40 多亿亩林地、近 40 亿亩草地和大量陆地淡水地域资源，是我们食物多元化的重要来源。

三

2023 年 4 月 10-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我国重要的沿海省份广东进行考察调研。广东拥有 4000 多千米的海岸线，是我国大陆海岸线最长的省份。此行第一站是三面环海的湛江，首先关注的就是发展海洋经济大事。该市雷州覃斗镇流沙港海域巨型长方体深远海养殖平台——“海洋牧场海威 1 号”新装备，能实时监控鱼的活动和水温水质。投放 3 万尾珍贵鱼苗，预计 2 年后总产值可达 0.5 亿元，成为渔民增收致富宝器。海洋正在成为我国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建设海上牧场成为广东省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一环。广东正着力培育万亿级现代化海上牧场产业集群。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忆在福建工作时说：“当时我就提出大食物观，肉、蛋、奶、鱼、果、菌、茶……这些都是粮食啊。”上篇文章，笔者根据公开的文件、会议，发现 2015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提“大食物观”。今天看来，作为一种社会学术观念，提出的时间更早。习近平总书记在从海岸线最长的广东谈到大食物观、海洋经济，给全国人民以重大启示，他说：“中国是一个有着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他提出，树立大食物观“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解决了从粮食安全到食物安全，从粮食到渔业的多元化食物途径大方向。他进一步具体分析“水产品的营养价值很高，提高我们国民的身体素质，把水产搞上去，把蛋白质搞上去很重要。耕海牧渔，发展海洋经济大有可为、大有前途。”海洋经济的效益十分可观。2030 年，广东省预计新增海鱼 201 万吨，按等量蛋白质换算，相当养鸭 15.4 亿只或养猪 3045 万头，接近现在养猪头数。

四

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视察广东强调：“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除海洋经济外，向陆上非耕地要食物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力发展草原农业，拓展草食家畜、家禽饲养，以增加高蛋白牛羊肉类和奶类、草禽肉类。除平地草原，尚有高原草场、林下草场和少量收割草场。另外，可发展林果业、茶产业、食花产业，微生物产业等。

在有条件的非耕地山地、丘陵发展设施农业温室，改变初期在耕地兴建农业温室的状况，或经营水培蔬果、食用花卉等。这可以腾出更多的耕地资源发展粮食产业。

五

可能是人的认识的滞后性和局限性，也许是媒体宣传的滞后性，在“大食物观”普遍被认识之前，一说到我们祖国的伟大，人们骄傲的大多是 960 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和奔流在其怀抱中的黄河、长江；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农业”多是奔波在陆地国土的“耕地农业”，说到骄傲的农业丰收，多是 6 亿多吨粮食的产量，充其量有人想到陆地上的草原农业——“畜牧业”产出的红色牛羊肉和洁白的牛奶；说到水产业，大多想到的是江湖上的捕鱼、养鱼。

我们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国土”认定的是“土地”，是“土”。所以一说国土就是 960 万，往往忘

掉了我们还有 300 万平方千米的大海水域；一说到祖国的伟大，往往忘掉了我国也是世界上一个海洋大国，我们的国土面积是 1260 万平方千米，不只是 960 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我国的海洋面积占全部国土面积的 1/4，是世界上一个资源丰富的海洋大国。我们祖国的“农业”是包括陆地经济和海洋经济宏大的综合的“大农业经济”！我们农业供给侧经济从把“大食物观”写入党的二十大起，应该全面调整到“大农业经济”观念上来。习近平总书记 2022 年 12 月 23 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从理论上理清了“大农业经济”观念。2023 年 4 月又考察调研了我国大陆海岸线最长的省份广东省，进一步阐发了“大食物观”和“大农业经济”理论，并从实践上对广东省布局、发展海洋经济优势的作法、章法予以了充分肯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程途上，在“大食物观”和“大农业经济”的思想指引下，我国农业将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巨大发展，为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强国做出重大贡献。

（作者：经济日报高级编辑。）

文化区域差异的两个样本：陕南秦岭和滇东南农村

贺雪峰

2019年5月笔者到陕南秦岭山区调研，发现虽然陕南基本上都是深山大川，耕地很少，陕南数县也皆为国定或省定贫困县，一般农户家庭收入却并不低，农民不穷。甚至，从饮食水平来看，陕南农民吃得比关中农民要好得多。农户也大都修建了比较宽敞的住房。笔者进入一个普通两山夹一川的村庄，一路向上走，路边几十户农户，家家都建有相当现代的住房。为什么在如此深山大川地区农户都有钱建这么好的住房？因为当地农户家庭中，年轻人进城务工，中老年农民靠山吃山，每年仅采中药材也可以有几万元的收入，何况满山都是板栗，都可以采集卖钱。最让人诧异的是，陕南数县2018年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接近100%，除上普通高中外，其他初中毕业生都上了县职高。100%升学率除了因为地方重视教育，普及12年教育，当地农民普遍有较强的教育意识，都希望自己子女接受更多教育，以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然也更有在全国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能力。依据笔者的有限调查，陕南诸县均被列为国定省定贫困县，实际上陕南农村贫困程度并不高（当然也不能说很富裕），被划定为贫困县的一个外界的想当然是：深山大川地区，耕地很少，农民没有土地收入来源，当然会很贫困。不仅陕南的秦岭山区，而且当前中国包括秦岭山区在内14个集中连片特困山区都是当前中国扶贫攻坚的硬骨头，其中原因就是这些山区人多地少，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交通也不便利。不过，仔细比较就会发现，这些山区情况也有差异，比如石漠化和高寒山区，就真的是自然条件恶劣，而秦岭山区、大别山区自然条件其实还是不错的，不仅有良好的自然资源，而且也有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

正是因此，笔者调研的陕南地区，农民家庭中，年轻人普遍进城务工经商，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获取务工收入，年老父母则留村，通过采集中药材、种植板栗树等靠山吃山的途径获得农业收入，农户家庭通过合理分工，以及通过勤奋劳动，获得了相当不低的家庭收入。而之所以陕南诸县职业教育比较发达，也与当地农户家庭有着强烈的进城务工预期有关。只要能将农产品输送到全国农产品市场，以及只要能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陕南农民就可以将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变成家庭收入，农户家庭就不会贫困。

陕南农村，农民之所以要不断提高家庭收入，在村庄建比较好的房子，甚至有越来越多农户进城买房了，其中原因之一是村庄存在着比较激烈的面子竞争。都是一样的条件，你家日子过得不好就会让人瞧不起。另一个更紧迫的原因则是，由于传统通婚圈被打破，性别资源从山区流失，进一步加剧了农村性别失衡，婚姻竞争变得激烈，农户家庭往往要通过代际合力来力争最好的婚姻条件，从而为儿子娶上媳妇。不能为儿子娶上媳妇，父母就没有完成人生任务，就无脸死后去见祖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论如何都要通过勤奋劳动来为子女争取婚姻条件。2017年5月笔者到滇东南民族地区调研，发现滇东南农村农民确实很贫困，当然也都被纳入全国贫困地区了。尽管调研的云南民族地区农村也是山区，

自然条件却并不差，植被良好，且物产丰富，进入新世纪交通条件也大幅度改善了。可以说，在自然条件方面，滇东南民族地区与陕南秦岭山区十分近似。不同的是，滇东南民族地区明显比陕南山区贫困得多：住房不好，家庭收入不高，积蓄就更少了。

为什么几乎同样的条件，陕南农村农民家庭会有较高收入，而滇东南民族地区仍然贫困呢？其中根本原因之一是，虽然现在交通便利了，滇东南民族地区农村，无论是农产品还是劳动力都没有进入全国市场上获取利益。调研的滇东南的一个村竟然没有一个农民外出务工，农村年轻人宁愿在家吃低保也不愿出去务工。当地引进一家大型外资企业，要招收 2 万劳动力，待遇还是很不错的，首批招进来培训的 2000 名年轻人，仅进入工厂生产线三个月就只剩下 300 人，其余人都忍受不了工厂生产线上的纪律约束。当地农民热衷于玩鸟、斗鸡、举办各种人生仪式，今日有酒今日醉，当地生产农产品基本上以自给自足为主，缺乏市场经济意识。而且，当地农民不重视教育，子女上不上学无所谓，学习成绩好不好也无所谓，甚至对于儿子能否娶上媳妇父母也抱有无所谓的态度。正是因此，在滇东南民族地区调研，感觉不到农民内在的发展动力。当地扶贫的结果是，既然政府给了资源，那就靠这个资源生活下去，还去生产干什么？还外出务工干什么？

显然，陕南山区农户收入与滇东南民族地区农户收入存在着巨大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本不在于自然条件（两地自然条件没有本质差别），而在于农民本身，以及决定农民思想与行为模式的文化的差异。

（作者：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来源：贺雪峰著《乡村的视角》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大有书局 2024 年出版）

光合高脂膜使农作物提质增产，减药减肥成为现实

徐 静

光合高脂膜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业大学韩金声教授发明的光合液膜的基础上，经过珠海润农科技有限公司多年的实验实践精心改进而成为现在这样的。它无毒无害，喷施在农作物叶面形成一层肉眼看不见的小分子有机保护膜，透气、透光，保水，阻隔病菌感染、防小型虫害咬吸。可提高光合效率，使强光保持，弱光促进，常光提升。它有抗病、抗虫、抗寒、抗旱、抗衰老、抗高温、提质增产、减药减肥等多种功能。它普遍适用于各自农作物。它不仅具有物理作用，生理作用显著而且普遍。

截止 2023 年底，它已经通过了中国水稻研究所、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多家农业科研机构的验证。光合高脂膜的多种功能在新疆克拉玛依总面积 2603 亩的耕地上，在 26 个农作物品种上进行的实验实践得到验证。

经过多地、多种农作物的实验证明，使用光合高脂膜可以使粮油增产 10%，水果 20%，蔬菜 30-100%；减少使用化学农药 50%，化肥 30%。延长保质保鲜期一倍以上。相比目前的化学农业种植技术，光合农业的种植技术更安全、更高效、更经济。我认为值得在更大的范围推广，值得给予一定的支持。

（作者：原农业部办公厅主任。）

关于农村固定观察点由来的回顾

——在 2024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工作座谈会暨调查员培训班上的讲话

孙中华

我非常高兴应邀参加这次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工作座谈会暨调查员培训班。刚才，春华副主任（注：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介绍我是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奠基人，对此不敢妄称，我只是最早投身于农村固定观察点工作的一员。40 年前，也就是 1983 年，我开始从事这项工作，并一直坚守到 1993 年。因此，我对这项工作有着深深的感情。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建立可以追溯到 40 年前，现如今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可能对当初建立的背景情况不是十分了解。下面，我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当初建立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背景和主要工作情况。

一、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建立的背景情况

1984 年冬至 1985 年春，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简称中央农研室）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一次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该调查活动是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开展的。1984 年 10 月 6 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转发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建议开展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的报告〉的通知》（中办发〔1984〕37 号）。该《通知》指出，“中央书记处同意农村政策研究室《建议开展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的报告》。今冬明春，在全国选择一批村庄，进行一次全面的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行的”。1984 年 8 月 24 日中央农研室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提出：今冬明春，每个省（区、市）各选择 10 个左右不同类型的村庄，进行一次深入、全面的调查；并在以后逐年了解这些村庄的发展变化情况，不断补充新的材料，坚持下去，形成制度。

这次调查活动，除西藏外的 28 个省（区、市）党委共抽调 8680 多人组成调查队伍，采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分别对 272 个村庄、37422 个农户、93 个乡镇、71 个县，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仅调查数据方面，涵盖了 1978—1984 年的情况，共涉及 4000 多项指标，原始数据达到 3700 多万个。这次调查共形成 2300 多份调查报告。除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提交报告外，还编辑出版了《1978—1984 年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资料汇编》，共 8 册。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工作是在这次调查活动基础上开展的。1986 年 2 月 14 日，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研中心（全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向各省（区、市）党委农村工作部门印发了《关于建立农村调查固定观察点的意见》。该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就建立农村固定观察点的目的、任务、组织方式等提出了具体意见。第一部分阐述了固定观察点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建立固定观察点的目的是：“直接从农村基层了解农村改革和各项建设的新动态，以便于从各个方面发展和对比中进行有连续性的综合研究，为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并指出，“固定观察点定在村（即原大队），以村和农户为主要调查对象”。第二部分阐明了固定观察点的任务和调查内容，指出“固定观察点的基本任务是对被调查的

村庄和农户进行长期连续的综合观察，积累材料，经常向领导机关和主管部门反馈情况”。具体要求有两个方面，一是搞好数据统计，二是搜集和反映活的情况，包括完成某些临时性的专题调查任务。第三部分讲的是固定观察点的组织工作。第四部分明确了观察点和被调查对象，指出：“为了充分利用已有的调查成果，保证调查的连续性和资料的完整性，固定观察点在 1984 年度调查村庄的基础上设置”“调查户的确定，应采取抽样的办法”“户以外的其它经济实体，有一家调查一家”。第四、五部分，分别讲的是时间安排和经费问题。

实际上，上述文件的主要内容以及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工作的开展，是中央农研室主任杜润生同志（以下简称杜老）提出和推动的。杜老 1983 年 3 月 16 日在全国农村信息点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初步设想，全国每个省（份）搞 10 个左右的大队或自然村，作为调查研究的基点。其中有的分布在信息点上，有的可以不在信息点上”“全国搞 300 多个村的调查研究，早一点部署为好。”（注：1981 年原国家农委在全国 19 个省份设立了 76 个信息点，其中 19 个设在地区、57 个设在县，目的是了解农村政策落实情况。1982 年国家农委撤销后此项工作转由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研中心负责）。分管农村固定观察点工作的领导同志是中央农研室副主任谢华、国务院农研中心副主任郑重。可以说，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发起者、奠基人、领导者是杜老和谢华同志、郑重同志。

从以上回顾中可以看出，虽然叫法上农村固定观察点起始于 1986 年，但实际上农村固定观察点起始于 1984 年，标志是 1984 年 10 月 6 日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转发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建议开展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的报告〉的通知》（中办发[1984]37 号）。将 1984 年作为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起始年，是基于这些观察点即村庄是 1984 年开展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时确立的，调查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上没有变化，只是当时没有叫固定观察点这个名字。尤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可以追溯到 1978 年，这一点非常有意义。这样说来，今年就是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建立 40 周年了。

二、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初期主要工作情况

农村固定观察点 1986 年及其最初几年的工作，总体上都是按照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研中心印发的《关于建立农村调查固定观察点的意见》进行的，重点是开展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是开展数据统计。针对四种调查对象分别设计了调查表：一是农户调查表，有 306 个指标，调查农户超过 3 万个；二是村综合调查表，有 193 个指标，调查村庄 293 个（1984 年调查时村庄数量为 272 个，到 1986 年增加到了 293 个）；三是经济联合体调查表，有 126 个指标，293 个村庄中共调查经济联合体 547 个（注：经济联合体是指农户之间、农户与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在自愿互利基础上，把生产要素以不同形式联合起来，实行以农户为主的联合经营，统一核算，自负盈亏，并具有明显企业特点的经济实体）；四是村（组）办企业调查表，112 个指标，293 个村庄中共调查村（组）办企业 786 个（注：以上调查对象数量为 1986 年统计情况，此后年份均稍有变化）。每年都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形成若干分析报告。1986-1990 年统计数据汇编成册公开出版。

另一方面是开展专题调查。我经历了五次专题调查。第一次是 1987 年 11 月开展的农民问卷调查，主要目的是了解农民对农村改革 10 年来的感受评价和意见建议，共列出了 50 个问题。调查范围包括 293 个行政村的 10938 个农户，形成了一份《关于农村改革与农民》的报告，摘要刊发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这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规模之大开创了全国农村调查先例。第二次是 1988 年初开展的农村私营企业专题调查，在 11 个省份 120 个固定观察点（行政村）进行，共调查了 97 家私营企

业，设计有厂长、工人和民众三种问卷。这次调查形成的报告，对于研究解决农村雇工问题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第三次是1989年初开展的粮食生产专题调查，对155个行政村、1.3万个农户1984-1988年粮食生产情况进行了一次系统调查，报告以翔实的数据资料分析了当时粮食产量出现下滑的状况及其原因，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第四次是1990年11月开展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专题调查，形成的专题报告很有深度，还出版了专著。第五次是1992年10月开展的农户与市场专题调查，共在312个行政村、7012个农户进行。此外，许多省份还开展了更为深入的调查研究，一个村庄形成一本专著。

三、对农村固定观察点特点的认识

10年的工作经历使我感到，与其它农村调查相比，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工作至少有以下四个明显特点：

一是直接性。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和资料直接向中央报送，无需经过各级逐级审核。这样做的好处，一是真实，二是快捷。这是杜老非常看重的一点。杜老在1983年3月16日的会议上讲到，“本来，通过正常的渠道反映也可以，但是太慢，而且经过过滤反映上来，就可能同原来的信息不一样”“我们想直接得到一些信息，这就是原来建立信息点的本意”（注：前面谈到，农村固定观察点有的是在原农村信息点基础上建立的）。

二是典型性。固定观察点不同于普查或抽样调查，它并不追求反映整体，而是注重解剖麻雀，对不同类型村庄进行深入了解。当然，在一个村庄内部会做全面调查，对农户则需抽样调查，以反映该村庄全貌。

三是长期性。观察点一经确定，就不轻易变动，需要长期观察下去。杜老在1983年3月16日的会议上讲到，“我们的调查研究要拉长线，不要拉短线”。他多次强调，固定观察点至少要搞50年。我们已经走过了40年，离杜老至少要求的还有10年。我们还需要加油。

四是深入性。对观察点的了解要全面、系统、翔实、深刻。杜老1984年9月4日在各省（区、市）党委农研室主任座谈会上提出，“在搞好300个村庄典型调查的基础上，可试办农村研究会（组），每个村有一支调查队伍”“这个调查不急于解决现实问题，要放长线……，研究解决基本问题”。

多年来，农村固定观察点工作有了很大变化，取得许多成绩。希望在坚持原有特点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取得更大进步。对今后固定观察点工作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深入整理和开发调查数据，特别是一直没有变动的那些观察村庄。这些村庄的数据最早可追溯到1978年，至今已有45年之久，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二是多开展专题调研。结合当下三农工作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决策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服务。三是对典型村庄进行变迁研究。我注意到部农研中心去年下发文件部署了此项工作，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期望每个固定观察的村庄都能有一本专著出版，剖析过去40年乃至50年发生的变迁，总结和归纳规律性东西。即使有些村庄已经消失了，这种剖析和研究也很有意义，可以反映出中国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变迁。

【注】：2024年3月5日，2024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工作座谈会暨调查员培训班在福建省龙岩市召开。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春华主持会议，中心办公室主任李晓东、固定观察点管理处处长王莉、固定观察点分析处处长张雯丽及有关同志，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固定观察点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和县级调查员代表共367人参加会议。）

（作者：原农业部总农艺师、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2024年3月5日）

学好全国“两会”精神，共谱壮美新华章

——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心得笔记

丁玉华

团结一心谋发展，砥砺奋进向未来。时光进入3月，2024年全国两会如期召开。

肩负人民重托，汇集民情民意，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齐聚北京，在全国两会这个“国是会议室”里，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这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意见场”，举凡国家大事、发展要事、民生实事，都是盛会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一个凝聚共识的“议政厅”，所有的建言、讨论、质疑，都是为了实现更好、更快、更强的高质量发展。

东风拂面万象新。观察今年两会，“新”是一个关键词。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等新论断新要求，进一步指明发展方向。政府工作报告中，“实施产业创新工程”，“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等新举措新安排，明确了具体落实重点。公布的新政策、凝聚的新共识，鼓舞亿万人民满怀信心走好新的征程。

大会高度评价过去一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大家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确定目标科学合理，提出举措切实可行，是一个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团结鼓劲的好报告。

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值此之际回望历史，人们越发深刻感受到“中国之制”历久弥新的生命力；直面现实，也会由衷地感受到生机勃勃的“中国之治”稳步向前。

2024年第4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文章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该刊编辑部配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

2024年第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文章指出：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进行伟大创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在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该刊发表了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的编辑部文章《汇聚起万众一心、团结奋斗的复兴伟力》。以上，习近平总书记的两篇文章非常重要。我认为，这就是全国两会的指导思想。

“中国的 5%继续在世界经济挑大梁。”这是《环球时报》文章的标题。政府工作报告中，2023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5.2%，为 126 万亿人民币。2024 年增长 5%就是 6.3 万亿元。实现 GDP5%的高质量增长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的要求。2024 年发展目标还包括，城镇新增就业 1200 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 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等。它们既是 GDP 的内涵，也是外延，一起组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延续稳中求进的总态势。

《人民日报》刊载：全国两会，国际社会读懂中国之窗。文章说，观察中国全国两会，有助于国际社会读懂中国之“治”、洞察中国经济发展之“质”、感知中国与各国携手合作之“志”。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最多的技术人才，科技创新能力，正在不断提高，中国人民勤劳且注重教育，这些因素共同注定了中国经济拥有强大韧性、巨大潜力。外媒认为，“中国现在的目标是通过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生活更美好”，“中国推动经济发展向创新趋动型转变，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将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树立典范。”

《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全球热议中国两会关键词”。从“新质生产力”到“高质量发展”，从“深化改革”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海外人士聚焦中国两会关键词，从中感知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韧性和活力，这些关键词是：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新质生产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共建“一带一路”、大国外交等。

彭博新闻社文章：从“人工智能+”到“新三样”，中国两会关键词是：新质生产力、未来产业、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人工智能”、超长期特别国债、放心消费、投资中国、“新三样”。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增长 30%。这三个行业都有助于推动脱碳。这个词也让人联想起中国制造业的“老三样”，即家电、家具和服装。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奋进中国式的现代化。在人民网开展的 2024 年全国两会调查中，“高质量发展”入选十大热词。今年全国两会上，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这一“新时代的硬道理”，代表委员积极建言献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代表委员表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 3 月 5 日参加江苏代表团时说：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抓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这是全国两会上的热议话题，也是关乎长远的发展课题、改革命题。

有的代表说：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以分针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被 20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用户访问超过 7000 万次；以秒计，5G 手机用户文件平均下载速率超 139 兆位/秒，观看视频的平均首次播放时延仅为 0.56 秒。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才能最终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关注前沿问题的科研工作者，就“加快打通国家新水平学术——技术——产业协同机制”等提出建议；来自生产一线的技术专家，从“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角度建言献策；在市场中搏击的企业家，对“以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先进计算技术与数智化机器设备、数智化劳动者等新要素紧密结合”提出见解。围绕传统产业焕新、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代表委员真知灼见，齐心协力推动生产力向新的质态跃升。

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又说：“保证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是切实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实施粮食单产提升工程。二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三是提升乡村发展建设治理水平。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热议，加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大家说，各种食品有效供给，百姓餐桌越来越丰富。

3月5日上午，全国人大举行了首场“部长通道”采访活动。记者就粮食丰收和脱贫攻坚成果巩固问题，向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提问。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答：粮食实现“二十连丰”数字真实可靠、完全可信。对于粮食丰收，唐仁健说，去年确实遭遇了频繁的极端的自然灾害，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最后我们还是实现了“以秋补夏”“以丰补歉”，粮食总产量达到了 13908 亿斤，比上年增产了 177.6 亿斤，再创历史新高。人均粮食占有量达 493 公斤，比上年增加 7 公斤，继续高于国际公认的 400 公斤的粮食安全线。

唐仁健还提到，现在的水利条件大大改善，已经有 10 亿亩的高标准农田，旱能浇、涝能排。2022 年长江流域很多省份遭遇历史极值的高温干旱，但是 89%的中稻和 95%晚稻都有水可灌。

谈到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唐仁健介绍，去年 832 个脱贫县所有的农民，包括脱贫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 16396 元，近三年每年年均增加都在 1200 元左右。同时，脱贫劳动力每年务工就业规模都保持在 3000 万人以上，只要有意愿，只要有劳动能力，每个脱贫家庭都有一个人以上实现了就业。此外，832 个脱贫县中，每个县现在都已经培育形成了大概 2 到 3 个以上的特色主导产业，而 90%以上的脱贫户都参与其中，能够分享收益。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75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时代，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昂首阔步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开辟的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沿着这条康庄大道前行，把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尤需坚定信心、开拓奋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在新征程上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华章。

（作者：丁玉华，农业农村部离退休干部局老干部。2024 年 3 月 17 日）

大寨——全国最封闭的村庄

陈大斌

许多了解大寨的人都说，“文革”中的大寨，紧紧关上了山门，成了全中国最封闭的村庄。笔者深有同感。1974年，我和另外一位记者受新华社之派来到大寨“蹲点”一年。所谓“蹲点”是一种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选择一个点，较长时间驻下去，进行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在昔阳县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相对容易一些，而大寨这个“点”，是无论如何也“蹲”不进去的。“文革”开始之后，大寨对记者采取极为严密的防范措施。1968年9月3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陈永贵的一篇文章，他说：“来大寨工作的各方面的人，和大寨人合不来，矛盾闹得最大、问题出得最多的，要数记者这一行。”他说有些记者受“刘毒”太深，有名利思想，“位置不对，所以写不好大寨的文章”。

据老记者说，“文革”之前，记者来采访是可以自由进村串门，和社员们说话的。从“文革”开始，大寨就紧紧闭上了“寨门”，所有记者和一切外来人员包括上级有关部门派下来的干部各色人等，都不许随便进村活动了。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参观者，千里、万里迢迢赶来膜拜大寨，其实只能排成队，由接待人员带领着，

从见不到人的村里穿过，按规定好的路线在虎头山腰走一圈，听讲解员背书似的讲一通，根本接触不到大寨的干部社员，也不准自由在村里和田间走动，对大寨能有多少了解，能取到什么“真经”，真是天知道。来采访的记者，不管你带有什么任务，一律到县里设在大寨村头的接待站递交采访、报道计划，然后就住下来等待。记者们不满这种安排，发牢骚时戏称这是递交“国书”。

“国书”交上去之后，接待站负责人再根据不同采访单位的要求，任务轻重缓急排队，更重要的是要看大寨大队党支部领导不在家，工作忙不忙，肯不肯接待，才能决定是否把各采访单位的“国书”转呈上去。接待站人员虽是县里派出的国家干部，有些还有县级领导职务，可在大寨绝不敢独断专行，处处小心行事。他们拿着这些“国书”进村时，见大寨支部领导人情绪高、脸色好时，才敢递上去；如若赶上他们不高兴，或正在发火训人，就吓得掉头溜之乎也，再急的“国书”也只好改天另瞅机会呈送。所以，递上“国书”之后，要等多少天也很难说。而在等待期间绝不允许记者自行进村串门，找社员谈话，不准上山参加劳动。

不许个别接触社员，那么大寨社员的集体活动，记者可以参加吗？也不行！不用说大寨党支部的支委会、党员会、大队的干部会，绝不许外来人参加，就是社员大会也不准记者参加。只有从北京、太原、太谷（山西农学院设在这里）等地来的农业专家们受到特别“优待”，因为他们每天要上山带着社员干活，传授农林牧等各种技术，不接触社员便无法开展工作。这些人在田间管理、果树栽培、马匹繁殖、山地种植水稻等方面贡献很大，大寨少不了他们。经过批准，他们可以参加某些社员集会。这使各家报纸电台的记者们无比羡慕。

不少记者在大赛、昔阳住久了，不满这种被封锁、坐冷板凳的处境，就向县委提意见，要求大赛改变这种“关闭”政策，至少应当让记者参加一些会议嘛。县里的同志满口答应“反映反映”，可每次都没有下文。追问紧了，县里的熟人才会对你说实话：“连我们县里干部也参加不了他们的会。”所以所有采访过大赛的记者，不管他来自何方，属于哪一级、哪一类媒体，在大赛、昔阳住过多长时间，都没有能够真正“进入”大赛村。新华社采访大赛时间最久的山西分社记者冯东书说过这样的话：“说来惭愧，我这么多年，只是进了昔阳，却从没有进入大赛。”他还说，“在大赛采访那么多年，直到最后离开，除了几名干部外，不认得几个社员。”他说却是实情。

记者们在大赛、昔阳的境遇如此。山西省、晋中地区是大赛的上级领导，可那里的各个部门的干部也同样进不了大赛。不少人便发起“牢骚”，说大赛是“中央直属村”，大赛党支部是“中央属支部”，那意思是大赛是谁也管不了，谁也不敢管的“独立王国”。还有人说大赛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组织严密的一个“铁核桃”式的封闭堡垒。

大赛关紧山门，把外来人一律拒之村外，同时也把自己封闭起来。这种做法也自有他们的考虑。在当时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山西两大派斗争激烈，陈永贵、大赛早早就陷入了其中一派，在山西树敌不少。所以对外来人大寨不能不防。再说，全国来的五光十色的参观者，每天都成群结队，多时超过万人。大赛只有七八十户，300多人，如对外来人员不加限制，大赛人的正常生产、生活，党支部和干部们的工作秩序必然被打乱，甚至正常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他们的这种“封闭”也是必要的。

但是，要在这样的地方“蹲点”，可就着实太难了。来之前，对于这种困难处境我们有所估计，也有所准备。但我们自认为，这一次我们不是一般采访，是受命来“蹲点”的；而且，我们都是几进大赛的“老熟人”了，对大赛的干部我们也都挺熟悉了，说明情况，是不是可以受到某些特殊照顾，让我们参加大赛的一些活动呢？可是，我们到了大赛之后，这点幻想也立刻破灭了。住下后我们便去找大队党支部书记郭风莲。在过去的采访中，我们与她已经相当熟悉，可以到她家串门，可以坐在炕头闲聊，赶上吃饭时刻，她蒸出的窝窝头可以抓来就吃，但要谈工作，对不起，还是老规矩：先报计划，支部研究后再谈。有的问题则要等老陈（陈永贵）从北京回来时再谈。这时大赛党支部书记已由郭风莲接任，但一切大事没有陈永贵发话仍然是绝对不行。

这一次我们虽然是打着“蹲点”的旗号来的，可大赛不给一点特殊照顾，同样是不准随意进村，仍然不准参加任何会议。有时吃晚饭时我们到郭风莲家去串门，可一有支委来商谈工作，或要开支委会，性格开朗，平时总是笑呵呵的郭风莲就马上变得严肃起来，毫不客气地下“逐客令”：“记者同志，请快走吧，我要开会哩！”有时我们用开玩笑的办法回敬，说：“既然赶上了，就不能让我们听？”郭风莲等在这方面是绝对坚持原则，绝不会放宽“政策”，最后她甚至会我们这些老熟人嬉笑着说：“快点走吧！还要我动手往外赶你？”所以，我们也都习惯了，只要一见支委们拢来，便会自动离开。

蹲不进去，我们只有千方百计设法多进村走动，以尽量多接触社员、干部，多了解情况。当时，新华社领导对“蹲点”记者要求在“点”上要与人民群众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可在大赛没法做到。住与吃，根本不可能到社员家里去“同”；我们想在“同劳动”上做点文章，大赛婉言回绝：还是干好你们自己的工作吧！除非春天植树等大规模义务劳动，记者可以跟上县直机关和公社的干部到虎头山顶去创坑、栽树苗，可那是与昔阳县直干部“同劳动”，连大赛社员的面都难得见到。平时我们自己上了虎头山，也不能到“大赛田”里去干活，偶尔在地头遇上休息的社员，凑上去也只能跟社

员们谈今天天气之类的“闲话”，不可能深入谈点队里的生产等方面的事儿。你想问点什么，哪怕是最简单、最容易回答的问题，也不会有人回答你。大寨社员警惕性很高，客气点的会对你说，“上接待处去问吧”。有的社员则会责问你，“你来问这问那，经过支部准许了吗？”弄你一个大红脸。还有些老实社员见你问话，紧张得左右张望，托故躲开，不敢搭理你。

如此这般，这个“点”“蹲”得实在太难了！大寨的封闭，是难以打破的。

（作者：文革期间曾任新华社驻大寨记者，原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瞭望》周刊总编辑。来源：《大寨寓言：“农业学大寨”的历史警示》2008年1月第一版）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农村厅）中国管科院机关及各研究所、中国食药促进会
发：中国食药促进会秘书处及各部门、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郭书田 毛振宾
副 主 编：谢久忠 辛 梅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www.moagov.cn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石 卉
邮 编：100125 100810
电 话：010—59195293 66117652
010—66067899 66167899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